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3月31日第6期 总第152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52期

北京大学文革专辑（八）

目 录

【专 稿】

俞小平 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

【评 论】

胡宗式 再谈 1967 年北大文革中的三件大事（一）

——兼答常风、魏明的指责

章 铎 我们最后的责任——答常风

【述 往】

俞小平 我的人事档案

刘 若 曾经的岁月——山东寿光炮兵农场的再教育

王复兴 迟群草菅人命，任由血吸虫肆虐

【资 料】

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重要讲话（摘要）（1967年9月1日）

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部分组织负责人讲话（1967年9月16日）

【编读往来】

1. 印红标谈古樟和辛伯仁之文
2. 常风答叶宁与顾勉之
3. 张从纠错
4. 甘仲义谈辛伯仁文中的问题
5. 张从对本刊的批评与建议
6. 《记忆》答张从先生

【本刊声明】

【专稿】



作者简历

俞小平，1945年生于江苏海安，1963年从南京九中毕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1970—1973年，任山西省繁峙县水泥厂技术员；1974—1982年，任北京燕山石油化学工业公司前进化工厂技术员；1982—1989年，任冶金部建筑研究总院环保所工程师；1990—1998年，任Chevron石油公司Gaviota石油初炼厂化学师；1998—2001年，任Capco环境分析实验室化学师；2001—2014年，任NuSil科技公司研发部高级化学师。1989年移民美国，现居加州圣巴巴拉。

做人的底线

——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

俞小平

我是北京大学校友，1963年考入北大技术物理系。自1966年6月至1970年3月，我在北大全程参与了这个时期的北大文革运动。就像我的同学们一样，在北大文革中见识、参与了很多重要事件。文革在中国史以至世界史上的重要性，不下于俄国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等震惊世界的大事。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以至世界最重要的大事之一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竟然基本缺席于中国现代史。不要说我们的下一代、下二代年轻人对文革缺乏基本常识性的了解，就连我们这些当时的参与者，年轻时期的记忆在我们的脑海里也是渐行渐远了。以致有人

说：中国根本就没有靠得住的现代史。如今，由于一些公众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文革史了解的匮乏，竟然开始呼唤文革了。因此我赞成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写下自己所经历的文革事件，共同还原文革的真相。具体到北大，无论你是新北大公社的，或者是井冈山兵团的，还是两派以外的逍遥派，都来写下自己经历的北大文革，共同还原北大文革的真相，构筑北大的文革史。

由于事隔多年，旧存资料已经基本遗失殆尽，只能凭记忆回想。如有事实上的错误，请大家指出，本人感激不尽。特别要说明，本人是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成员，叙事观点可能带有派性，而这正是我想要避免的。

在1967年8月17日井冈山兵团成立后，井冈山兵团成员不承认校文革是领导全校的权力机构。因此在1968年的北大大武斗时期，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是北大支持聂元梓一派势力的两个机构：校文革是北大权力机构，新北大公社是受校文革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即使井冈山兵团不承认校文革，校文革仍然掌握着全校党务、行政、人事、财政、住宿、食堂、物资、保卫等等大权。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两位一体。这使井冈山兵团在北大的派别斗争中从一开始就注定处于劣势。¹

北大文革于我印象最深的，是1968年历时四个月的大武斗。我在网上读到的北大文革史，谈及北大大武斗的不多，只有唐利²、张曼平³、李竟然⁴、司徒文⁵等人的文章，以及聂元梓的回忆录⁶。我想从我的个人经历描述我所亲历的武斗事件和我的感受。

北大大武斗是怎么开始的？

¹ 《中共中央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中发[1970]17号，1970年3月15日。

² 唐利：《我的北大文革记忆》，载《共识网》，网络版。

³ 张曼平：《我所经历的1968年北大武斗》，网络版。

⁴ 李竟然：《北大文革武斗纪实》，网络版。

⁵ 司徒文：《亲历者讲述——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文史精华》2009年第7期，网络版。

⁶ 聂元梓：《聂元梓口述自传》，（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原新北大公社同学（及教职员工，下同）的文章，大多将大武斗开始的日期定为1968年3月25日，地派（“北京高校地质学院派”的简称）各校近万人涌进北大反对新北大公社、支持井冈山开始。3月22日，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倒台，聂元梓和校文革十分被动，士气低落。25、26日，外校人员虽然与新北大公社人员发生冲突，规模并不大，且多为拳脚相向，没有听说几个人受伤，而且北大井冈山人员大多没有参与。在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下令外校人员退出北大后，事情就基本平息，没有发生更严重的冲突。3.25冲突与其后大武斗中的3.29、4.26、7.22、7.23武斗相比，在事件的策划、伤及的人员、对运动的影响上，都是完全不能比拟的。27日，全校人员大多参加了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师大会”大会，北大两大派都去参加了。校内安静，但是气氛十分紧张，有传言说新北大公社要发起进攻，井冈山总部安排各纵队（井冈山兵团的系级单位称为纵队，以各系的编号为纵队编号，如技术物理系编号为第17系，井冈山组织就称为17纵，加上后勤青年工人组成的“海燕纵队”。我们也自称“井冈山人”或“老井”）派人前往28楼井冈山总部执行保卫任务。28日晚轮到我们的17纵，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前往，在28楼戒备。

过了午夜，忽然听到外面噪声大起，有同学衣衫不整，冲进楼门说出事了，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大举进攻31楼，把化学系03纵井冈山派的同学打出来，很多井冈山人受伤，有人跳楼逃跑。总部启动广播喇叭，来自17纵的总部委员程汉良在广播中呼吁井冈山人抵抗新北大公社的武装进攻。我们在28楼的老井，组织了二三十人，每人拿了一根大约一米长、一厘米粗的钢筋当作武器防身，向31楼推进，企图救援受伤的井冈山人，在31楼南门附近遭遇了数十名装备精良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公社武斗队看到我们过来了，立刻排列整齐、手持长矛、高呼口号向我们冲锋。在对手优势武力的冲击之下，我们无法抵抗，只能狼狈而逃，退回28楼。不仅31楼，40楼也打起来了，幸亏10纵的老井预作准备，在其他纵队的支援下，竟然打败了准备不足的红10团（新北大公社的系级组织为“战斗团”，

西语系的新北大公社组织间称为“红10团”），俘获大约30名新北大公社成员，连红10团团长都被俘。“战俘”被押送到28楼，关押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

28楼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老井，也送来了越来越多的伤员，有些人受了长矛扎伤，有些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印象深刻的是一个陷入昏迷的伤员，他被送来后，放在楼道里的一张桌子上，一直没有苏醒，腰部一片鲜血，看护他的人说他的腰被打断了，不能移动。后来来了救援的卡车，这个伤员连桌子抬上卡车，送到医院去了。天快亮的时候，我顶不住困乏，找了个房间去睡觉，尽管外面两派大喇叭吵翻了天。没有看到聂元梓陪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来到武斗现场，没有看到武斗策划者聂元梓来装事不相干的好人，没有看到聂元梓被刺事件。

井冈山认定3.29武斗是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策划的，新北大公社同学是否同意？从一些公社派成员的回忆录看，至少有部分公社派成员认同这一点¹。既然武斗是聂元梓策划的，武斗发生了又到现场，装着没事人的样子，快意地观赏她的部下造成的后果，这样的人的道德底线在哪里？

北大3.29武斗之后，聂元梓的朋友、同为“北京高校五大领袖”的清华大学团派头头蒯大富在他的回忆录《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²中说：“清华武斗之前，北大3月29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我们也想学这样做。”蒯大富对3.29武斗的评论，揭示了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策划、发动武斗的阴谋的目的：迫使中央表态，打垮井冈山兵团。中央表态了，谢富治支持了发动武斗的校文革，谴责了损失惨重的井冈山兵团。但是井冈山没有垮，井冈山人熬过了最初的打击，井冈山人撑住了。

把3月29日凌晨在31楼发生的攻击称为“武斗”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不是双方对阵的武斗，而是新北大公社专业武斗队对31楼井冈山03纵的蓄谋已久的突然袭击。校文革

¹ 司徒文：《亲历者讲述——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文史精华》2009年第7期，网络版。

² 米鹤都：《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的风云人物》，（香港）中国书局，2011。

企图以这一招打垮井冈山最强大的一个纵队。新北大公社达到了它的目的：重创03纵。当夜井冈山至少一百多人受伤，很多老井“被俘”。但是这种偷袭也激起了井冈山人同仇敌忾的士气，使北大文革走向大武斗的不归路。我不是31楼的住客，化学系03纵的唐利著《我的北大文革记忆》¹和张曼平著《我所经历的1968年北大武斗》²对当时当事有详细的叙述。当夜对着我们冲锋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从武器、装备、组织到后勤，都占了巨大的优势，一个强势的当权派向一个弱势的在野派发动突然袭击的优势。其后几天，一个老井给我看了他们从公社派那里缴获的一支长矛。那长矛外面是橙红色涂层，显然是用无缝钢管原材料截取的，长约1.6米，比我的身高（1.78米）略低些，直径约2厘米多，顶端焊有一段约15厘米长1厘米粗的钢筋，钢筋顶端用砂轮磨得尖锐锋利无比，闪烁着冷酷无情的钢铁光泽。这是北大两派冲突中从未出现过的武器！我看着这样的长矛，心想他们就用这样的武器往同学身上戳吗？这样的利器刺出，带着钢铁重量的惯性，足以把一个人刺个对穿，并且取其性命！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是当权派，有权、有钱、有物资、有住房、有食堂，有权卡住教职员工的工资、学生的助学金不发，有权给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成批下发棉军大衣、柳条帽、长矛，后来更以昂贵的不锈钢板材成批切取护胸甲，冷兵器时代的武器他们都有了。井冈山有什么？什么也没有。无奈之下，只能锯下楼内的暖气管做长矛，模仿新北大公社，也在暖气管上焊上钢尖，头戴规格不一、各处收集来的柳条帽，身披材料不同的护胸甲，披挂上阵，面对不时冲击而来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了。

在3.29武斗之前，无论出过什么事，对北大人的生活整体影响不大。3.29武斗之后，大批师生员工逃离北大。3.29当天我住的41楼附近的小南门被校文革关闭封锁，逃难的人群推倒了校门旁边的一段围墙，越过豁口逃生。我所住的41楼挨着武斗现场40楼，再住在那里很不安全了。我把我的一些细软送到我的朋友家里，把床上的被褥和洗换衣物扛到28楼去了。

¹ 唐利：《我的北大文革记忆》，载《共识网》，网络版。

² 张曼平：《我所经历的1968年北大武斗》，网络版。

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副司令李钟奇来到北大制止武斗，听信的全是一面之词，井冈山被人袭击，反而都是井冈山的不是。这样的调解无以服众，也没人服从。新北大公社想打垮井冈山，而井冈山更想死里逃生。双方的“战俘”倒是都释放了。连被校文革抓去、残酷刑讯逼供的樊立勤都被从44楼的新北大公社总部扔了出来，因为樊已经被折磨得奄奄待毙，校文革怕他死在他们的刑讯室里没法交代。详情可见颜品忠《一个北大哲学系普通教师的动乱劫难》。¹

樊立勤事件

说到樊立勤，樊可是北大文革名人之一，当时在北大无人不知。樊胆大包天，不但挑头反对聂元梓，而且敢于“炮打”势焰熏天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因为反康生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从1966年底就有两个小组织“井冈山”（这个组织是“井冈山红卫兵”，不是后来的“井冈山兵团”）和“红联军”支持他，北大大多数人觉得他的观点太极端，自他“炮打康生”，做了“现行反革命”，敢于支持他的人就更少了。1967年8月井冈山兵团成立时，井冈山总部接纳了支持樊立勤的“井”、“红”，但是不接纳樊立勤。可是几乎所有不抱偏见的人都佩服他的胆量和宁死不屈的精神，聂元梓更视他为头号敌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1968年3月下旬，校文革突然放风，说现行反革命分子樊立勤外逃，跟着就发出通缉令，实际上他们已经把樊秘密逮捕，在44楼刑讯室里私刑拷问逼供了。1960年代的人们爱提起的国民党罪行之一，就是中美合作所下属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酷刑。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和小说《红岩》描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数不胜数的拷问方法，我们没有亲眼见过。可是在1968年3月下旬，新北大公社的酷吏们就在刑讯室里以同样骇人听闻的酷刑，强迫樊立勤承认校文革欲加之的“现行反革命”罪名。樊宁死不从，新北大

¹ 颜品忠：《一个北大哲学系普通教师的动乱劫难》，颜吾芑的博客，网络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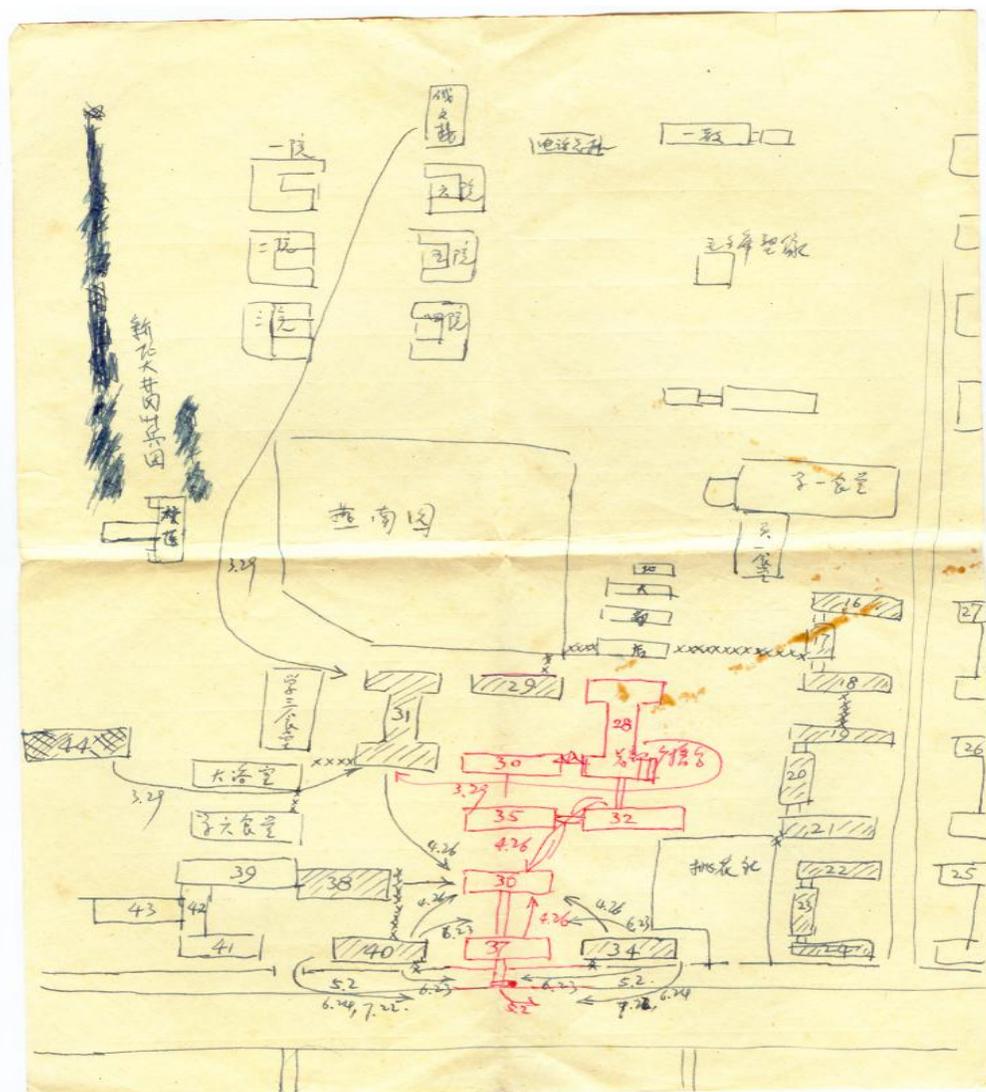
公社的酷吏们竟然以铁钉钉入膝盖、竹签插入指甲等酷刑将樊拷问了四天四夜！6月初，我去北医三院看一个被新北大公社酷刑逼供打断腿的同班同学，他告诉我，樊立勤就在隔壁病房。我从窗口看到樊满身通着管子，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樊被救以后，在北医三院住了很久。1968年8月工宣队进校后，又限制他的行动自由，直到1969年3月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进校后，才将樊送去医院治疗。樊的膝盖矫治手术失败，落下了终身残疾。1969年，我和几个同学在北大南边的海淀镇巧遇樊立勤，大家见他终于“出来了”，都上前问长问短。问起他的“刑伤”，他挽起裤管，给大家看他膝盖上的铁钉钉伤。大家都愤怒地臭骂校文革的监狱酷刑逼供的惨无人道。

校文革的围剿和井冈山的反围剿

大武斗开始后的校文革及新北大公社，日益压缩井冈山的生存空间。井冈山人去食堂吃饭被打，上海淀镇购物被打，在校园里路过被打。4月26日爆发了3.29武斗以来的第二次大武斗。这一次，井冈山主动出击占领36楼，使得井冈山占领的楼群能够从校园内部的井冈山总部和广播台所在的28楼到海淀路边的37楼连成一线，打破校文革的封锁，得以苟延残喘。占领36楼是井冈山不得已的选择，为了生存不得不为，不是老井们要去伤人。

新北大公社同学的回忆录，抱怨他们的人被井冈山的弹弓射出的砖块打破了头，在此我愿向被打伤的新北大公社同学道歉，那时我们双方都有点失去人性。但是我希望读者看一看图上的形势，到底是谁在围剿谁？如果井冈山真的要挑起武斗，怎么会摆出这样一副挨打的架势？3.29井冈山已经占领了40楼，因为没有想到后来会打成这样而放弃了，后来40楼成为新北大公社西线武斗指挥部和钢一连的驻地。东边的34楼很孤立（再往东的一个院子不属于北大，是一个生产挑花工艺品的小工厂），井冈山要想占领也很容易，这里后来成为新北大公社东线武斗指挥部的驻地。40楼西端是北大的小南门，34楼东端的围墙打开了一个豁口。这两个出口是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出击地和封锁线，离井冈山楼群的

唯一出口，37楼前的围墙豁口都不到一百米，公社武斗队在这两地日夜监视井冈山人的出入，想抓谁就抓谁，抓进去严刑拷打。



图一：上面的这张北大武斗形势图，是我在1968年8月武斗结束后，手绘寄给我的父母的。因为我的母亲保留了我写给他们的全部信件而得以保存至今，如今是一件难得的“文物”了。地图上北下南，最南端是北大校园南墙，墙外东西向的海淀路，是进出北大学生宿舍区的主要道路。所有武斗占领的楼，除了井冈山总部的28楼（原为越南留学生

宿舍楼，越南留学生离开后基本空着）和新北大公社总部的44楼（原为北大招待所），都是学生或教职员工的宿舍楼。红色绘的是井冈山占领的楼群，黑色绘并加以斜线的是新北大公社占领的楼群，楼上的数字是楼号。带箭头的线显示双方的进攻与防守，线上的数字是武斗的日期。连续的×××××是新北大公社的封锁线，由双层床等家具构成。井冈山在28楼西南端与30楼东端之间的四楼架设了天桥，各楼地下开挖了地道，地面各楼之间的道路用双层床联通，以躲避新北大公社的弹弓的袭击。由图可见，井冈山防守的六座楼几乎被新北大公社占领的楼群完全包围，只剩下37楼通向海淀路的一口气了。

不说别人，仅仅我所在的班的老井，为了在楼间架设双层床躲避新北大公社的弹弓，梁正路被弹弓射出的石块打在胸口，好半天喘不出气来，胸口疼痛多日。陶令煌被石块打在额头正中，一时血流披面，送到北医三院做了缝合。武斗结束后伤疤仍在，好像前额长了第三只眼睛。

我所在的班，井冈山成员有30多人，在武斗中有三人被新北大公社抓捕。第一个是郭青苔。郭在3.29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攻打31楼时路过附近，被公社武斗队拦住，问明是井冈山成员，就抓进新北大公社总部44楼，酷刑拷打，以致打断了腿，昏迷不醒。4月初双方交换“战俘”时才放出，送到北医三院。我就是在那时跟着总部委员程汉良去慰问他，顺便看到了九死一生的樊立勤。

第二个被抓的是我自己。大约4月10日，我在海淀镇的废品收购站想买点半导体收音机元件，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强抓到44楼，用我的衣服蒙头押到楼上，强迫我承认在海淀镇偷卖新北大公社成员的物资。我被钢管在头上、脚上暴打，打得头破血流，打裂了脚踝骨，放出来后好久不能走路。

第三个被抓的是女生周振琦，是在5、6月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抓她关押数日，殴打折磨，放出来后精神恍惚。也许不必深究原因，你是井冈山兵团成员，这就足够了。

如此算来，我所在的班有10%的老井被捕过。井冈山全体成员大约有数百人被捕过。

井冈山兵团怎样生存

校文革已经把井冈山兵团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控制的保守组织”，保守组织要打垮，反革命集团成员要抓捕。为此校文革在3月20日就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以高云鹏为总指挥。待到3.29之后，新北大公社包围井冈山的形势形成，更在其下成立了西线武斗指挥部（驻40楼，以我的同系同级同学宫香政为西线总指挥）和东线武斗指挥部（驻34楼，以黄树田为东线总指挥），从两边夹击37楼的出口。¹为了防卫弹弓的袭击，37楼前架设了宽5米、高4米、用竹木苇席搭成的大棚，从37楼直达海淀路边。大棚日夜有人把守，以防新北大公社攻击。我作为17纵成员，驻守28楼，有时到37楼前来“放风”。闲来无事，井冈山人也会在大棚下用长矛比试，互相切磋武艺。有时比着比着，就看见新北大公社从40楼旁的小南门或34楼前的豁口拉出队伍，装备整齐，准备向37楼前的井冈山前门出击。每到此时，井冈山值班的前线指挥就会让不相干的人员离开大棚，也拉出武斗队来准备防卫。海淀路成了北大武斗的主要战场，自5.2武斗后，所有的长矛队的对攻都发生在海淀路上。如果37楼前门被新北大公社攻占，井冈山的气数可就到头了。

北大两派武斗不仅震惊全国上下，而且让外国人也深切关心，西方国家的报刊登出北大武斗的文章和照片。全世界人民都在惊讶，这个中国最高学府到底出了什么事，要用古代的冷兵器拼个你死我活？每逢武斗，海淀镇居民是现场最忠实的观众。尽管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敢于向井冈山的前沿冲锋，用长矛捅进同学的身体，却不敢伤害海淀镇的居民。这使海淀人能够救援对阵中弱勢的井冈山人，阻止公社武斗队的长矛刺向受伤倒地的老井。

老井们要想离开被包围的井冈山楼群，就得通过海淀路两边的新北大公社封锁线。最安全的办法是在37楼前的大棚下等候，待到32路（现在的332路）公共汽车向东开到马路对面南侧的汽车站时，快速越过马路，冲上32路车。但回来时就没有那么方便了，因为

¹ 李竟然：《北大文革武斗纪实》，网络版。

马路北侧的32路车站在新北大公社把守的小南门的西边，下了车必须越过小南门才能回到37楼前。比较安全的方法是坐到下一站下车，然后往回坐一站，到南侧32路站下车，越过马路就到37楼了。32路车不是老能等到的，如果你要步行通过两边的新北大公社防线，你就得冒被抓进去的危险。有时大棚下的人们，眼看着一个井冈山人被抓进去了，但是无能为力，无法救援。多少人就是这样被抓走、被关押、被拷打的。

在校内，数百名教职员被校文革关进“牛棚”非法关押，几十名井冈山人长期私刑关押。新北大公社不仅在北京抓捕井冈山人，甚至以校文革名义派人到外地以抓捕现行反革命为名抓捕井冈山总部委员和重要成员，以公函写信给外地井冈山同学的家人，诬以参加反革命集团控制的保守组织的罪名，以致许多老井的家庭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



校内武斗，校外要造舆论帮衬。井冈山没有电台，没有报纸，大喇叭声音也传不远，在北京市内就只有靠大字报了。抄大字报是件费力费时的工作。为了提高效率，老井发明了油印大字报。油印的大字报有八张蜡纸那么大，就是把大字报内容刻在八张蜡纸上。油印的时候，四个人面对面站着，每人手拿两个油印网，网上沾好了刻就的蜡纸。从第一个开始，把第一张网放在全整张的白报纸上，油墨滚子一滚，这八分之一就印好了，第二张对好了缝，印上去，接着印下一张，直至完成八张蜡纸的油印，这样一整张的油

（图二：武斗结束后的天桥）印大字报就完工了。虽然也挺麻烦，比人力抄写到底快多了。一套八张刻好的蜡纸可以印数百张大字报，同样内容的大字报一天功夫就可贴遍全北京城，

就像出版了一份报纸。此项“先进技术”一旦出来，立刻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在为“刺聂案件”的辩诬过程中，打得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无言以对。

由于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越来越严密的围困，井冈山人在楼群内也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危险，驻守在楼内的人也越来越少，武斗中后期大概不过三百多人。话说回来，人多也有人多的难处，人多了粮食和蔬菜的供应就更加困难。但是我们不能不坚持下去，井冈山要是垮了，我们就要成为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了，全国各地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楼内谁留谁走完全是自由的，没有人强迫。即使是总部委员也是一样。我所知道的在楼内坚持到武斗结束的井冈山总部委员有：侯汉清（勤务组组长）、陈醒迈、谢纪康、靳枫毅、胡纯和等。

在两派大喇叭的宣传战中，新北大公社最得意之作，便是广播井冈山人的“下山声明”。校文革以各种手段，威胁恐吓，强迫井冈山人退出“保守组织井冈山”。在整个四个月的武斗中，据公社说，有一千多老井被迫“下山”。我们井冈山兵团的文艺宣传队“万岁纵”（“‘毛主席万岁’文艺宣传纵队”的简称）的乐队的一位西语系的女生，被以“不予分配”相威胁，被迫“下山”并交出她使用的小提琴。待到武斗结束，所有人的毕业分配实际未受派别影响，她很后悔“下山”。



两派武斗队驻守的楼群都是四层楼。井冈山楼群的一层门窗都被钉死，二、三、四层不住人的也钉死，有些楼的楼顶是平顶（28、30楼），用弹簧床、双层床等家具构筑成防御工事，墙边堆有砖块并架上弹弓。弹弓开始用的是自行车内胎剪成的橡胶带，然后改（图三：武斗结束后的28楼楼顶，防御工事已经拆除，还能看到楼顶墙上堆积的铁床、砖块和墙边的暖气片。）成汽车内胎。因为弹力不足，射程不远，重点防守地点改成乳胶管，弹力大增。两股橡胶内胎橡胶带或乳胶管中间绑上篮球或排球剪成的球皮，再绑在长

板凳的两条板凳腿上，板凳架在桌上，推到窗口，在球皮里安上砖块或卵石，拉长皮筋，就可以瞄准目标射击了。一般老井用的“炮弹”是四分之一块砖（有些回忆录说是半头砖，我以为不确，半头砖太重，

射不了多远，除非用乳胶管）。有时也用鹅卵石，那是公社派打过来的。新北大公社用卡车从永定河的河滩拉来鹅卵石作“炮弹”，威力自然比砖块大得多。我们不能在各楼之间走动，要走得经过双层床构筑的通道，而新北大公社成员却可以在井冈山楼上看不到的地方自由行动，这让我们大为不快。有一次我和我班的另一个同学，从28楼北侧楼顶向29楼西北端外面打球的新北大公社同学吊过几颗砖弹，然后趴在墙边看“战果”。我看见公社派同学四散而逃，一个同学瘸着腿跑开，显然是被我们的弹弓打到了（不会是直接打到了，是被打在地上的跳弹打到，直接打到的话他就不能走路了），当时很得意，在此我和我的同学都愿向他道歉。

当28楼和30楼之间的天桥完工时，我和很多同学来到四楼，很惊讶地看到完工的天桥。我与同学们一起，用水龙带拉住天桥，对面的30楼同学向30楼拉过去，把天桥稳稳地架设在两楼之间的四楼上。我参加过挖地道，把下面挖出的土装在脸盆里，用脸盆吊到地面，堆在一楼的房间里，以免被新北大公社看到。

我曾在天桥上多次穿行于28楼和30楼。因为有人很狡猾地贴了伟大领袖像，新北大公社不敢用弹弓打天桥上的行人，害怕犯攻击毛主席像的“罪行”。地道建成后我只进去过一次。6.24北京汽车三场的卡车为井冈山送菜，遭到公社武斗队的冲击，掩护汽车的井冈山人被刺伤。作为外单位人员，汽车三场的司机竟然也被刺成重伤。人家单位告到北京市革委会，竟然被人污蔑为“送派菜”！从此井冈山的后勤就越加困难了。一天夜里，我已经睡下了，将近半夜，17纵纵队长郑修聪悄悄叫起几个人，说有任务，要穿上大衣，带上柳条帽。我们跟着他，下了28楼的地道，跟着路标走向37楼，地道里有蜡烛照明。到了37楼，上了地面，只见楼里灯光暗淡，守楼的人员手持长矛不碰地面，以免出声，人们也低声交谈，一片临战前的紧张状态。我们几个人被告知，今夜有车运粮来，我们不带武

器只管卸粮。一会儿听到海淀路上马蹄声得得，原来是一辆马车。车夫勒住驾车的马，打算把车赶进大棚。那匹壮马看到大棚里黑漆漆的一大堆人，绕了一个弯不肯进来。现场指挥改变方案，让车夫把车停在大棚门口，我们一帮装卸工冲出去抢运粮袋。不过一分钟的功夫，粮袋都卸下来堆在大棚里面。这时东西两线的新北大公社喇叭咋咋呼呼地叫喊起来，车夫鞭子一甩，马儿发力狂奔，十几个井冈山武斗队员手持长矛跟着跑动护送，一直把马车送过西线40楼旁的小南门。新北大公社武斗队连大门都没来得及开，事情就结束了。

我们住在被封锁的井冈山楼群内，食堂是不能去了，只能自己开伙。28楼南端一层楼有一个锅炉房，一个浴室。南门外堆着一小堆碎煤，是去年秋天就运来供应浴室锅炉烧热水，用了一冬天剩下的。武斗开始后有时烧水供应大家洗澡，有时用热水蒸馒头供应大家。因为用得节省，这看着不起眼的一小堆煤竟然一直用到武斗结束。井冈山总部没有能力供应全体人员的伙食，吃饭主要得靠各纵队自己开伙。17纵买菜做饭，主要靠几位女生。买菜要冒被打被抓的风险，还得节约着点吃。夏天米长了米虫，要搁在平常时期就倒掉了，如今供应紧张怎么舍得倒掉，拿水淘淘照样吃了。我们做饭主要用电炉，北大的水电大权控制在新北大公社手里，碰到新北大公社拉闸断电，就只能吃半生饭。

我是井冈山兵团的文艺宣传队“万岁纵”的乐队队员，6月下旬，总部要“万岁纵”在地质学院组织七一纪念演出以鼓舞士气。我离开了北大，前往地院。地院东方红公社是北大井冈山兵团最忠实的盟友。他们接纳前来投奔的北大井冈山人，老井有数百人住在这里。地院分出一座楼给我们居住，一个食堂让我们自己开伙，“前线”下来的伤员不能长期住在北医三院的，地院的校医院都予以接纳。这里是北大井冈山离北大最近、最安全的后勤基地。“万岁纵”在这里排练节目，七一在礼堂表演，井冈山的同学们都很兴奋，增加了“长期抗战”的决心。进入7月，新北大公社对井冈山的封锁日益严紧，我们得到通知，非必要不要回校去。我在地院一直待到7.23井冈山在海淀路上接高压线的大武斗之后，才回到井冈山的楼内。

武斗的意外终结

7月27日夜，我在28楼楼顶值班，下午开始从临近的清华大学传来的枪声使我们非常不安。7.23武斗，井冈山成功接通一万伏高压电线到井冈山楼群内，打破了校文革对井冈山的供电封锁。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冲击接电现场失败并致多人受伤，他们肯定不能容忍这样的失败，肯定会制造新的武器装备，肯定会策划新的进攻。清华团派用步枪射杀四一四派人员，新北大公社会不会也步其后尘？井冈山的前途在哪里？井冈山要是被打垮了，我们都得完蛋！

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传来了好消息，毛主席派遣的数万工人在解放军的领导下进入清华制止武斗。前夜我听到的枪声是清华团派在负隅顽抗，而四一四派已经在工人的劝说下缴械投降。一旦7.28凌晨毛主席召见北京高校五大领袖的消息传出，团派的抵抗立刻土崩瓦解。毛主席在召见五大领袖时警告：“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就要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¹甚至到了这种时候、这样场合，聂元梓也不想想她的好运就要终结了，竟然还敢在毛主席面前诬陷北大井冈山兵团：“侯汉清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侯汉清）是研究生，父亲63年搞投机倒把。……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校文革）没有搞他（指樊立勤），他和彭珮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²这是什么样的卑鄙？这是什么样的无耻？新北大公社的同学们，你们怎么摊上这样一个领袖？

但是说到底，谁敢跟“伟大领袖”对抗？从7月28日开始，北京市革委会派出的制止武斗的宣传队每天数万人进出北大，新北大公社对井冈山的封锁立刻被打破。我们走出楼群，走在四个月不敢走过的校园里，不用担心再被抓捕、再被毒打。“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两派的成员也罢，逍遥派也罢，开始大批返回校园。到了这个时候，两派都明白，武斗结束了，学生主导运动的局面也结束了。这样的烂摊子，轮不到北大任何一派来收拾，我们

¹ 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华夏文摘》增刊第458期，2006年，网络版。

² 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华夏文摘》增刊第458期，2006年，网络版。



都得乖乖地听人吆喝了。8月19日，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开进北大。名义上是“宣传队”，但是既然《人民日报》社论都说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自然就是工宣队当家了。趁着还没有搬回各系居住的宿舍楼，我悄悄溜回在

南京的家，直到10月初才应工宣队的通知回到学校。

（图四：武斗结束后17纵部分成员在37楼前合影，大门前的大棚已经拆除。）

我们在文革中有底线吗？

我们中国人的文明社会，古称华夏，自来就有一套道德规范，历二千多年而不变，讲的是忠信孝悌礼义廉耻。即使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讲究以阶级斗争为纲，道德规范有所变化，基本道德也是相差无几的。文革中由于阶级斗争观念的泛滥，我们听信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理论，放弃了一些道德理念，但是做人终归不能没有底线，至少我们不撒谎、不诬陷、不偷盗、不欺诈，至少不能做违法的事，不能杀人、不能伤人、不能殴打、不能非法监禁、不能刑讯逼供。做人要有做人的底线，越过底线，就不是有道德的人，不是有良知的人，就是野蛮人，就要被大多数人唾弃。

井冈山兵团的成员也犯过错误。我们听信了毛主席的诬陷，没有认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以为陆平是“反革命黑帮”，我们参加批斗陆平及北大干部和教师的各次大会，有些干部教师被逼自杀，家破人亡。对于这些事件，我们应该忏悔。但是我们还是有底线的，具体到我们班的井冈山兵团的成员，基本没有做我们认为是错误的事。1965年底，我

们北大学生被派下乡，去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如今我的认识是：四清是替毛泽东和刘少奇的高层权力斗争构筑社会基础，简单地说就是找茬镇压农民。虽说是镇压农民，工作队还是要讲纪律的。在运动中不能搞体罚，工作要努力，做事要公平，像现在的贪腐行贿想也不要。因此在1966年八一八以后，当红卫兵开始在社会上以“破四旧”为名大肆迫害平民百姓、知识分子及其子弟时，我所在的班的一些同学采取了与暴虐的红卫兵（以干部子弟为主的中学红卫兵，又称“老红卫兵”）截然不同的做法，对抗在海淀镇横行不法的“红卫兵海淀区纠察队”（简称“海纠”）。在海淀镇邮局与一帮中学红卫兵论战大半夜，救了一个红卫兵企图抓走的邮局职工，因而被本系一些同学贴大字报，攻击我们“反对红卫兵破四旧运动”。即使我们为了保护自己，没有再对抗海淀镇的红卫兵暴行，我们还是我们的底线的：我们自己绝不参与这样的暴行。

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在什么地方越过了底线？

北京大学，自1898年成立京师大学堂起，历经晚清、民国、北洋、国民党与抗战时期，一直是一个文质彬彬、研究学问的最高学府。即使中共执政以后历经多次政治运动，伤害了一些教师和学生，也没有残暴到这种地步：在校园内外以执政机构的名义，抓人、打人、杀人，直至肆无忌惮的地步。

原新北大公社的同学们，如今北大的武斗已经远离我们达48年了，你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到底做错了什么，以至于在文革结束后追究文革罪行时，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至少有6名成员被捕入狱、被判徒刑，其中包括校文革主任聂元梓、第一副主任孙蓬一、文攻武卫指挥部总指挥高云鹏，以及为打死三个学生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新北大公社成员。

聂元梓是个“革命老干部”，12级高干，参加过延安整风。1960年靠她的哥哥聂真与北大校长陆平的关系调入北大。1963年到哲学系任总支书记，校党委委员。陆平对她不能

说不重用，聂却恩将仇报，以一些不能成立的理由，攻击陆平犯了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由于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中支持陆平，聂不得不检讨。做检讨在当时的中国算得了什么？没打你没骂你没降级没罢官，对也罢不对也罢不值得深仇大恨。可是聂元梓记恨在心，探得党中央内部斗争的风暴已经爆发，挑头签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家可以看看她在大字报最后一段加的是什么：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¹

显而易见，既然陆平要倒大霉了，聂元梓就可以这样落井下石，报北大社教运动之仇了！看看她写的这些令人惊心动魄的词句，陆平就被她聂元梓定性为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这是什么样的蛇蝎心肠？这是什么样的投机心态？聂元梓一夜之间变成全国最著名的革命造反派，而陆平成了“陆平黑帮”的头子。我们做学生的不明底细，你聂元梓可是一清二楚。其后陆平被关押、被批斗、被审讯、被吊打。1966年8.15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斗争陆平，比他级别高的彭陆罗杨陪斗，十万人齐声高喊“打倒陆平”，在雨里从下午斗到晚上。你在台上意气风发主持大会，陆平在台下弯腰低头被批斗，你说陆平心里怎么想？当时他的心大概已经死了。1975年陆平被解放，调到七机部当副部长。这“陆平黑帮”是怎么回事，谁给他说明白过？谁给我们这些被欺骗的“群众”说明白过？在陆平的问题上，你聂元梓

¹ 聂元梓：《聂元梓口述自传》，（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的良心在哪里？你的底线在哪里？文革结束后，陆平继续当他的干部，你聂元梓在监狱里坐牢。这是为什么？这是报应！2001年，北大校友李海文约谈陆平，陆平准备了九个问题，谈了一次就住了医院，从此不能再谈。¹当我到了老年时，才能体会陆平这下半生的痛心。如今陆平已成故人，我想对他说一句道歉的话而不可得。陆平同志（这是当年北大人对他的称呼），陆校长，我作为北大的学生，为我对您做过的一切伤害，向您说一句：对不起！

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里对自己应付的责任常常这样搪塞：“我不知道”，“我管不了”，“我不是新北大公社社员”。这样的话不能免除她的罪行，只能让人不齿。新北大公社的同学们，你们说说，聂元梓这样说话，能够搪塞得过去吗？聂元梓不是你们的领导吗？聂没有领导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吗？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行动没有聂的策划吗？聂没有组织策划指挥北大武斗吗？如果真是这样，谁在领导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谁对武斗负责？谁下令把数百名北大干部教师关进“牛棚”，谁下令抓捕井冈山成员，以致几十名井冈山人员长期在新北大公社私刑监狱里痛苦呻吟？谁对三名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私刑打死的学生负领导责任？北大两派武斗场上没有死一个人。被打死的地质学院附中高三学生温家驹（死于1968年4月19日）、无线电系62级学生殷文杰（死于1968年4月27日）、地质地理系61学生级刘玮（死于1968年7月20日）²，都跟武斗现场毫不相干。事件发生后，在组织严密、纪律森严的新北大公社，你聂元梓的部下不可能不向你汇报。你不是瞎子，你不是聋子，全校人都知道的事，我们这些被封锁在井冈山楼群内的井冈山人都知道的事，你聂元梓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你既没有按照党纪国法作任何处理，也没有采取措施控制你的部下不得再犯，使得私刑打死人的事件一再发生，你聂元梓凭什么说你没有责任？

1978年4月19日，聂元梓在全校大会上被捕入狱，1983年3月16日被判处17年徒刑，1984年6月保外就医。她的判决书指控的罪名是：“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群众，

¹ 陆莹：父亲是知识分子，《中华读书报》记者陈洁采写，载《光明网》2008年3月12日，网络版。

² 唐利：《我的北大文革记忆》，载《共识网》，网络版。

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¹多年来聂元梓一直不承认她被指控的罪行，并且企图翻案。在此我说说我个人的看法。

对于聂元梓的刑事责任，除了聂元梓在校外所犯错误和罪行，我更重视的是她在校内所犯的罪行：

诬陷新北大井冈山兵团这个革命群众组织为“反革命集团把持的保守组织”——诬陷革命群众组织罪；

策划并指挥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挑起武斗围攻井冈山兵团——策划并指挥武斗罪；

在北大、北京市以至全国范围内非法抓捕关押井冈山兵团成员——非法逮捕公民罪；

设立非法私刑监狱（牛棚）监禁北大师生员工——非法监禁公民罪；

在校文革设立的监狱里以残酷私刑拷问折磨井冈山兵团成员——酷刑罪；

在校文革控制的区域纵容残酷的私刑迫害，致使三人死亡——纵容杀人罪。

聂元梓是北大校文革主任，新北大公社是校文革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聂元梓对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所犯错误和罪行负有领导责任。正如她的朋友、清华井冈山兵团团派的头头蒯大富要对清华百日大武斗中死亡的18条生命负责一样。虽然法院对她的罪行定性不准确，但是判她17年刑期并不冤枉。如果聂元梓不忏悔她所犯的罪行，她就没有资格为法院对她罪行的某些错误定性喊冤。

孙蓬一是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忠实追随聂元梓，聂元梓的罪行都有他的一份，他被判10年徒刑。1990年代我在美国洛杉矶的三联书店里，在一本有关清华和北大的文革回忆录里读到孙的消息。他在刑满释放后深自忏悔，向他所在的哲学系的两个井冈山派教师道歉。他做得对，我个人愿意原谅他。可惜的是当时我没有买下这本书，不能用作参考文献。

¹ 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华夏文摘》增刊第458期，2006年，网络版。

高云鹏是校文革文攻武卫指挥部总指挥。他不但在北大指挥武斗，在此之前还在陕西汉中北大分校指挥武斗，真正的机枪步枪冲锋枪手榴弹炸药的战争。他参与指挥围攻、爆破汉中运输公司大楼，造成29人死亡。¹他被判刑10年是理所当然的。

井冈山人参加大武斗是为了本派的生存，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底线：不能打死人，最好不要致人重伤，使其失去战斗力就行了。北大武斗中死亡的三个人，都不是死在两派武斗现场。温家驹在刑讯室里被酷刑致死，事发后我们得知新北大公社的狱卒们使用了骇人听闻的刑具，让守楼的井冈山人心中恐惧颤抖。由于没有书面证据，在此就不谈了。殷文杰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员用长矛刺死在44楼新北大公社总部门前，身上被扎进39个血窟窿²。刘玮被抓进40楼，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员轮番殴打致死³。新北大公社成员抓人、打人以至打死人，不是偶然现象，这显示一些新北大公社成员丧失了人性，丧失了做人的底线。我听说，每次新北大公社打死人，都在内部造成愤怒和矛盾，有些成员就此脱离武斗，做逍遥派去了。

工宣队的检讨

以63军（4587部队）为首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接掌北大大权后，搞的是支一派（新北大公社）打一派（井冈山兵团），搞了一千个反革命专案，逼死三十多名师生员工。在北大搞得天怒人怨，连毛主席都坐不住了，1969年3月派了他的御林军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来收拾局面。北大工宣队主任、63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信不得不在1969年4月在东操场召开的全校大会上宣读报告，以大量篇幅检讨工宣队所犯的错误，并且对校文革作了定性：

¹ 余杰：《风暴中的燕园》，载《余杰文集》，独立中国笔会，网络版。

² 胡宗式：《文革期间北大的殷文杰同学被刺致死事件》，《华夏文摘》增刊第957期，2014年9月，网络版。

³ 司徒文：《亲历者讲述——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文史精华》2009年第7期，网络版。

校文革在运动的中、后期站在“公社”一边，形成了一派掌权。他们“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实行所谓“亲我则亲，冷我则冷，打我则打，反我则反”的原则，实际上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对立面革命群众组织采取了从政治上搞臭，从组织上摧垮的方针，把对立面组织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操纵的保守组织”……校文革在运动中、后期实际上变成了“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后来，虽然在组织上联合了，并且在基层成立了有两派群众参加的革命委员会，但是由于没有纠正原来一派掌权的错误，使两派群众仍然没有消除对立情绪。¹

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成员们，你们觉得聂元梓等人判刑坐牢冤枉吗？你们认为新北大公社这样迫害井冈山人是应该的吗？这样做符合做人的道德吗？你们心中有做人的底线吗？像我们中国人一直说的，摸摸自己的良心，想想这些在武斗中发生的事件。你们不觉得刘信的迫不得已的检查讲的是实话，是实事求是的吗？

武斗期间井冈山抓过人吗？

新北大公社成员会问：难道你们井冈山人在武斗中没有抓过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人吗？你们自己不是也应该忏悔道歉吗？

是的，井冈山在武斗中抓过人，除去 3.29 武斗井冈山抓的人（3.29 武斗中井冈山是自卫，没有主动进攻），在以后四个月的大武斗中，据我所知，井冈山一共只抓过两个人。

第一个是戴新民。戴新民文革前是技术物理系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委员，北大社教时著名的左派，文革初期选为校文革委员，中后期支持井冈山兵团。4月初，有消息传出戴新民是“叛徒”。她要是叛徒，再落到新北大公社手里，井冈山就有麻烦了。17纵决定把她控制起来，免得校文革把她抓去严刑逼供，弄出对井冈山不利的事来。17纵队长带了

¹ 1.《中共中央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中发[1970]17号，1970年3月15日。

几个人去她家，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到了老戴（戴新民很平易近人，全系上下都管她叫老戴）家，要她跟我们走。老戴是个老干部，做过地下工作，想必也知道这一去没有好事。到了井冈山楼群，在28楼17纵驻地给了老戴一个单间，平时也不怎么管她，只要看见她在就行，谁也不跟她说话。日子过了一月又一月，老戴没人跟她说话，只能看书，更加无聊烦闷。有一天老戴企图偷偷逃走，被老井们发现。问她为什么要跑，她说北大武斗打成这样，她要去市革委会反映。以后照旧把她控制在楼内，直到武斗结束。如今这事已经过去48年，老戴已经过世了，没能当面向她道歉，总觉得是件憾事。参与拘押戴新民是我在文革中做的少有的违法行为之一，如今反思这件事，我个人应该承担道义责任。

第二个是一个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员。时值7月的一天，我正在地质学院住着待命，忽然有人从城里打电话过来，说老井在新街口被公社武斗队打了，要我们赶紧过去支援。我们一行二十多人赤手空拳，分批乘公共汽车前往新街口。下车不远就看到一个老井在马路边收拾东西，见到本派大队人马到了，赶快迎上来诉说刚刚发生的事：他们几个人正在街上贴大字报，一辆公社派的卡车载着带长矛的武斗队赶到，抓住老井就往车上扔，只有他一个人逃脱。周围的市民一看不干了，纷纷前来保护老井，指责公社武斗队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抓人的恶行。武斗队赶快开车落荒而逃，一个武斗队员不幸落单，被市民们抓住，已经送到新街口派出所去了。我们一行人立刻赶到新街口派出所跟警察要人，警察哪里肯给，我们又不是专政机关，凭什么把人交给我们？可是我们如若不能带人回去，被抓去的人怎么办？井冈山可是有几十人押在新北大公社的“监狱”里哪。好言不听，我们也就不客气了，上前架住那人就往外走。几个警察没敢阻拦。回到地质学院，问话的结果，这人是工人，家里有老有小。果然不过半天，校文革就打电话来要求谈判。新北大公社那边丢了一个人就闹翻了天，那人的老婆哭哭啼啼地找他们的头头要人。我们的头头说放人可以，你们也得把这次抓的几个老井都放了。那边没有讨价还价，立刻同意。双方确定交换地点在五道口，第二天双方人员就交换了。这是井冈山在3.29武斗后唯一的一次抓捕新北大公社人员，没有殴打，没有侮辱。严格地说，这次井冈山并没有抓人，我们只是把这个专事

抓人的武斗队员带回地质学院，换回了我们被抓去的人员。对于参加这次抓人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面对强权，我们有权自卫。

新北大公社的同学们，如果你们知道更多的井冈山兵团在大武斗中的违纪、违法、违背良心、违背底线的行为，请你们揭发出来。我们两派的组织不在了，我们不再年轻，但是我们的良心在，我们做人的底线在。如今文革已经远离我们，如果我们不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留下文革的记录，揭示文革的真相，并且传之后代，我们就在文革中白吃了那么多的苦，枉受了那么多的罪了。

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清华大学校友陆小宝在他的《我们这代人最后的责任》中说：“文革运动搞得天下大乱，害了这么多人，死了这么多人。我们的一些同学就在清华大学的百日武斗中失去了生命。每想起他们，我们心中都会产生出一种锥心的伤痛。为了死去的他们，为了未来的后代，我们应该利用渐逝的迟暮之年，把我们当年那段亲身经历说出来。只要我们说的是真实的，就会有价值。只有我们说的是真实的，才会有价值。真实的东西，只有我们将它们说出来，才会有价值。当时你属于什么派，是保守还是造反，是老团还是老四，并不重要。史识可以不同，史实只有一个。真实与否，不能任人雕刻；正确与否，听凭后人评说。真实比正确更重要。为历史，为后代留下真实的记录，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¹

诚哉斯言！无论是新北大公社还是井冈山兵团，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北大人，都应该为我们的后代留下真实的记录，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2016年2月3日初稿

2016年3月18日定稿

陆小宝：《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载《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8。

【评论】

再谈 1967 年北大文革中的三件大事（一）

——兼答常风、魏明的指责

胡宗式

《记忆》143期所刊笔者《从三件大事的记载看〈北京大学纪事〉》一文（以下简称《三件大事》），回顾了1967年北大文革中发生的三件大事，即反击“二月逆流”、揭发吴传启和“炮打谢富治”的基本事实，指出《北京大学纪事》的相关记载歪曲了历史真相。常风、魏明两先生在《记忆》147期上发表《究竟是谁在歪曲历史的真相？——评胡宗式对〈北京大学纪事〉的指责》（以下简称《常文》），对拙文予以批评。历史的真相是什么？究竟是谁在歪曲历史的真相？本文就《常文》提到的几个问题，再作一些探讨，并看看《常文》的作者究竟是怎样对待历史事实的。

一、 关于反“二月逆流”的月日

笔者在《三件大事》一文中说得很明确：新北大公社对整个“反二月逆流”事件反应迟钝，且有保留看法，但表面上的选边站队还是做了的。对于谭震林，表态由“炮轰”转为“打倒”，对李先念、陈毅、余秋里的提法是“炮轰”（上纲上线也是很高的），保周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的态度则是明确而坚决的。尽管新北大公社作了一系列的表态，但并不被认可，一直被校内外的反对派称作“二月逆流派”。究其原因，就是北大在“一月夺权”时成了关锋一伙的绊脚石，得罪了他们；新北大公社在“反二月逆流”中又不肯紧跟。因此，在关锋、王力、戚本禹一伙看来，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已经是政治异己和保守组

织了。

《常文》说：“而在当时，在毛泽东表态和中央文革的组织下，北京高校的群众组织也都毫无例外地卷入反对所谓‘二月逆流’的行动中。”

请问《常文》的作者，你们当时知道中央上层发生了什么事吗？当时知道毛泽东表态了吗？当时知道中央文革出面组织了什么，是如何组织的吗？

后来被指为“二月逆流”的“怀仁堂事件”，是发生在中央高层极小范围内的事，当时保密极严。正因为不知道事件的经过，更不知道毛泽东说了重话，大多数北京高校才先后以不同的态度卷入“反二月逆流”浪潮，并产生了所谓的“打倒派”和“炮轰派”。如果当时知道了毛泽东的表态，按那时的行事规则，或许所有的群众组织都会一边倒地表态，不至于发生后来那么大的分裂。但那样的话历史就要改写了。不过历史不能假设；如果非要假设的话，出现另外一种无法料想的更加严重的局面，也不是不可能的。历史也会是另一个样子。

“反二月逆流”的浪潮首先是由北师大“井冈山”掀起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吴传启操纵的学部联队。北师大“井冈山”的头头谭厚兰是听林杰的，而吴传启的后台就是关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鉴于“一月夺权”时他们的表现，北大对他们产生了怀疑，对他们挑头发起的事情，不得不有所警惕。在红代会讨论当时的形势时，谭厚兰对他们掀起“打倒谭震林”浪潮的背景，守口如瓶，什么都没有说。但大家都知道他们这样做是有后台的。至于究竟是谁出面组织他们掀起这一场风波的，又是如何组织的？说了些什么？笔者当年没有打听到，而且，直到近五十年后的今天，也没有见到有谁出面披露事情的详细内幕。即便有人提到，也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如席宣、金春明所著《“文化大革命”简史》，只简略提到戚本禹按照江青的指示，找北师大“井冈山”头头谭厚兰作了布置，而后谭厚兰率人冲击并占领了农展馆，喊出“打倒谭震林”的口号。¹ 高层的事本应在高层解决，不应该把群众牵扯进去，把中央高层发生的事情私下泄露或暗示给某一两个群众组织，再

¹ 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143页。

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某项政治目的，这既不光明正大，更是一种严重的泄露国家机密的犯罪行为。历史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党内会议大批“二月逆流”，介绍所谓“怀仁堂事件”和“京西宾馆事件”的经过，并且向下传达的，是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但群众只听到一点不完整的口头传达。就笔者而言，直到读了《王力反思录》，才对当年发生在高层的这场风波的内情有所了解，但这距1967年3月7日已经过去了近40年。

“反二月逆流”浪潮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是1967年3月7日，即北师大“井冈山”首先向谭震林发难的日子。无论是北大校内的反对派，还是校外的反对派，都用这个时间节点作为标准，来衡量新北大公社的行动。

北大“井冈山”的喉舌《新北大报》载有《聂孙之流就是不折不扣的“二月逆流派”》¹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

三月七日，师大井冈山公社打响了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炮。……正当社会上轰轰烈烈地反击二月逆流的时候，北大正沉浸在围攻郭罗基同志大字报的热潮中。直到3月12日战斗团团长会议上，他们还说什么“现在打倒谭震林不保险”……当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时，迫于形势的压力，新北大公社总部才被迫于3月14日发表了一个声明……。

……在校外，孙蓬一之流赤膊上阵，疯狂炮打谢副总理。因谢副总理在反击二月逆流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支持了革命造反派，故被谭震林之流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孙蓬一之流炮打谢副总理的逆流正好适应了谭震林们的需要。……同时，新北大公社竟然在大街上刷大标语要“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受到了陈伯达同志的严厉批评。此后，社会上那些“拥护二月逆流派”就纷纷向北大靠拢（如大庆公社，民院抗大，轻工红鹰，农口老保等，充当了孙蓬一炮打谢副总理的马前卒），而那些反击二月逆流派（如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

¹ 参见本文附录1，原载北大“井冈山兵团”编辑出版：《新北大报》，1968年3月22日。

地院东方红，民院东方红等）就渐渐地成了聂孙之流的眼中钉。

按照上引《新北大报》的文字，“正当社会上轰轰烈烈地反击二月逆流的时候，北大正沉浸在围攻郭罗基同志大字报的热潮中”，这一个“热潮”，不正是郭罗基先生的大字报引起的吗？这不正好说明北大正陷于内部事务，刚刚成立的新北大公社还顾不上过问社会上的事情，对“反二月逆流”的背景一无所知吗？既然《常文》要把社会上的事情和北大的事情联系在一起，那么，“正当社会上轰轰烈烈地反击二月逆流的时候”，郭罗基同志为什么把矛头指向聂元梓，而不写一张反击“二月逆流”的大字报呢？还有，请问《常文》的作者，你们当时又做了什么呢？发表了什么意见呢？

上引《新北大报》的文字还说，“当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时，迫于形势的压力，新北大公社总部才被迫于3月14日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不正好说明新北大公社总部的被迫与无奈吗？

《常文》的作者对3月7日到13日这将近一周的时间内新北大公社总部的艰难历程，只字未提，对笔者在《三件大事》一文中列举的事实，也一概视而不见。不过《新北大报》是你们自己的喉舌，上引《新北大报》的文字，请你们仔细看看，是不是可以给你们提个醒呢？

对新北大公社在“反二月逆流”中的态度，有人是一天一天给记了账的。1968年4月18日出版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报》就有这样的账目。¹ 其记录之详细，似乎在新北大公社总部派驻了一名戴着有色眼镜的坐探，进行着严密的监视，一天也不放过。限于篇幅，不能照录全文，谨摘引其中几节：

三月七日，师大井冈山公社打响了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炮。这一炮打得准，打得

¹ 《为“二月逆流”翻案的自供状——评二月十五日〈新北大〉报的〈招魂〉》，载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报》，1968年4月18日。

好，得到了中央文革和谢副总理的坚决支持，全市以至全国造反派马上风起云涌地响应起来，次日，形成全市性炮轰谭震林的高潮！接着，“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响彻全市。

反击“二月逆流”的迅猛声势吓得“二月逆流派”新北大公社聂孙之流目瞪口呆，魂不附体，哪里还敢公开出来保？于是，他们采取按兵不动，窥视时机的策略。一天，二天，……六天过去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在北京市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所有的高校都表示了态，但是路线斗争觉悟“很高”的新北大公社聂孙之流却“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迟迟不动。……

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的怒涛冲得聂孙之流晕头转向，于是急忙接连召开串连会，战斗团会议，分析形势，以定对策。会上，新北大公社动态组、作战部大吹“谭震林是一贯跟着毛主席的”，“几十年的历史都是革命的”，“谭震林打不倒”，真正是“慷慨激昂，义形于色”！无奈形势逼人，新北大公社头头们面面相觑，焦躁不安，后来有人提议：“轰谭不保险，还是打李雪峰好”。“为了谨慎，我们还是不轰好”。争论到十二日夜，还是“谨慎地”决定“暂不表态”

十四日，看形势实在顶不下去了，新北大公社总部才扭扭捏捏、装模作样地发表了一个言不由衷的“声明”，被迫同意红二团和红十六团参加一些革命活动。但即使是这样，聂孙之流并没有放弃原来的立场和观点，还继续顽固地隐蔽地站在“二月逆流派”一边。

在毛主席的统帅下，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击溃了“二月逆流”。四月，就在我们乘胜追击谭震林余党的时候，聂孙之流就迫不及待地“破门而出”，开始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肮脏活动。

上引北大“井冈山”《新北大报》和地质《东方红报》的文字，都指责新北大公社是“二月逆流派”，而且是“不折不扣的”。这是他们一以贯之的立场。但是，近来情况不同了。《常文》的作者从故纸堆中发掘出了北大校刊《新北大》刊登过的文字，有了重大发现，原来，新北大公社并不是“不折不扣的二月逆流派”，而是“大胆、主动和积极”

的“反二月逆流派”。那么，人们应该相信《常文》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是相信当年的《新北大报》和地质《东方红报》呢？

《常文》刊出了《新北大》发表的《新北大公社声明》，这是确确实实的，其产生背景，笔者在上次的文章里已经说过了。我们注意到该声明的编号为003号，这表明此前还有过两份声明。这些声明的内容，因为手头没有资料，只能凭残存的记忆来推测。声明的内容应该包括3点：①支持中央文革，②保卫周总理，③“炮轰”谭震林。①、②可能在同一份声明中，③可能是单独的；另一种可能是：①、②是两份单独的声明，而没有③的内容。如果能找到这些声明的全文，将有助于了解当时新北大公社总部的心态。

《常文》还列出了《新北大》发表的若干批判谭震林的文章，以证明新北大公社在打倒谭震林的问题上“是多么大胆、主动和积极”。既然有这样的证据，新北大公社不就是“反二月逆流”的英雄了吗？那么，《新北大报》和地质《东方红报》为什么还要坚持说聂、孙和新北大公社是“二月逆流派”呢？《常文》的作者既然有这样的证据，为什么不在新北大公社受到攻击的时候拿出来两说两句公道话，为新北大公社辩解一下呢？

从3月7日反谭震林的风暴乍起，到3月14日的声明，新北大公社总部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符合当时形势的发展，合乎逻辑，是正常的。最后发表的声明，真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表态站队，似乎成了当时文革政治的核心要件。同样，形格势禁，在3月14日之后，《新北大》发表批判谭震林的文章也是形势使然，别无选择。这一点也不奇怪。如果在这个时候还要公开保谭震林，那不等于同中央文革（实际上是毛泽东）公开对抗吗？对于一个群众组织来说，这样做无疑是自取灭亡，反倒是不正常的了。在当时的形势下，北大和新北大公社，必须谋求自保，否则真的会被打成保守派。学部的总队，就是前车之鉴。不要说区区北大，伟人如周恩来，也无法继续公开为谭震林说话。文革史专家卜伟华写道：“过去周恩来对批谭一直持保留态度，但这时也改变了口径，3月14日，周恩来的联络员董枫在财贸联络委员会讲话说，谭震林的问题同志们

认为要搞就搞，由大家决定。”¹

新北大公社总部尽管发表了若干声明，《新北大》也发表了若干批判文章，但有什么用呢？中央文革是不承认的（他们对北大要“揪出反谭震林的后台”这种谣言倒是深信不疑），别人也不承认（见上引《新北大报》及《东方红报》的文字），我们自己其实也不承认，这只不过是在高压下为了应付和自保而采取的权宜之举。另外，社会上持相似立场的许多群众组织，也从不相信这是新北大公社的真实态度。没有想到的是，过了近半个世纪，居然得到了《常文》作者的承认和肯定。

需要指出的是：贴出“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这种大标语，是别有用心的栽赃。奇怪的是，这样明显不合常理的谣言，居然会被中央文革采信。1967年5月27日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召见聂元梓谈话时，关锋说：“你们要揪出反谭震林的后台，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奉陪。你们还要保余秋里，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错误就可能爬不起来了。”聂元梓当即反驳说：“这些情况是别人谎报的，不是真的。像二月四日关锋同志批评我们‘三路进军’一样，根本没有那回事。”²所谓“三路进军”，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谣言。北大参与教育部夺权时，因为反对有叛徒嫌疑的卢正义，同支持卢正义的北师大“井冈山”发生了冲突。为了支持卢正义，打压北大，“三路进军”的谣言就应运而生了。关锋、王力给聂元梓打电话：“听说你们北大学生要兵分三路，一路冲中央文革，一路冲北京军区，一路冲《红旗》杂志社。你们为什么总要冲？好，我们不怕，我们等着你们呢。”³关锋、王力这两个中央文革的大员，黔驴技穷，居然亲自出马，用谣言来打压北大，而这也就暴露了他们自己。在1967年5月27日的这次召见中，戚本禹还对聂元梓说：“你也有问题，但我们计较了吗？你还说什么六月要血洗北京城。”⁴聂元梓说“六月要血洗北京城”？这样离奇的谣言，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应该追查？但戚本禹不去追查谣言，却要用谣言来

¹ 卜伟华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出版，2008年，第455页。

² 《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第220页。

³ 《聂元梓回忆录》，第200页。

⁴ 《聂元梓回忆录》，第220页。

对聂元梓施压。王、关、戚为什么那么相信谣言呢？因为这种谣言符合他们的需要，或者，就是他们自己捏造出来的。

笔者当年同《新北大》编辑部没有工作上的联系。《新北大》是校刊，由校文革领导。《新北大》发表的那些批判谭震林的文章，是如何组织的，作者是谁，笔者都不了解。但当年的编辑和作者，现在应该还健在，他们自己应该是清楚的。《新北大》发表这些文章，是因为新北大公社发表了“打倒”谭震林的声明，打开了闸门，其责任当然由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总部承担。但话也要说清楚，新北大公社是刚刚成立的，而且是按系组织的，各系同学原先同外单位有什么联系，并没有过问过。就笔者记忆所及，公社红2团和红16团有一些人较早介入了农口的运动，并且支持了反谭震林的一派。这与公社总部的观望保守态度产生了矛盾，按《新北大报》的说法，他们受到了公社总部的压制。但是，新北大公社总部发表了3月14日的声明之后，这种压制就不存在了。按《东方红报》的说法，新北大公社总部“被迫同意红二团和红十六团参加一些革命活动”。这样看来，《新北大》发表的那些批判谭震林的文章，很可能是他们的作品，或者是他们提供的。至少，这方面的情况，他们比笔者了解得更多。这些人对新北大公社总部很有意见，陈伯达6.5讲话之后就脱离了新北大公社，参加了“井冈山”。《新北大报》和《东方红报》在“反二月逆流”问题上对新北大公社的许多指责，材料也可能来自他们。

二、关于北京市的夺权和北京革命造反公社

《常文》用了许多文字介绍聂元梓在“一月夺权”中的表现，企图以此证明，聂元梓“极力想利用‘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金字招牌，抢夺北京市的大权。”

聂元梓想要“抢夺北京市的大权”吗？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当时的环境，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当时的环境里来探讨。

“一月夺权”，或称“一月革命”、“一月风暴”，始于上海，最后遍及全国，上上

下下，概不能免。这场运动是由毛泽东主导的。文革史学者王年一指出，“全面夺权的号召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又以党的名义发出，在夺权面前人人无可回避地要表明态度，因而全民卷入了。……当时不仅几乎各省、市、自治区一级都进行了夺权，不仅几乎中央各部委都在夺权，而且下面千千万万个单位都在夺权。人人谈论夺权，处处争论夺权。”¹王年一列举了贵州、黑龙江、山西等省的夺权后指出，“这些夺权，都是中共中央批准了的。从根本上说来，这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不是什么‘篡夺领导权’。”²笔者以为，王年一的评述是公允的。

如果没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聂元梓要去北京市参与什么夺权活动，人们一定认为她是个疯子，“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金字招牌，一点用也没有。后来的事实表明，即便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下，在北京市的夺权风潮中，聂元梓那块金字招牌也没有什么用。

正因为夺权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1967年1月中旬以后，北京也出现了全面夺权的风潮。最著名的，是1月13日《解放军报》的夺权，这是军队内部的事情，且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据卜伟华所著《“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一书，³北京市最先夺权的，是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公社联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人，于1月12日、14日两次夺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权；1月15日是北京轻工业学院的群众组织到第一轻工业部夺权。令人瞩目的是，1月17日，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和北京市公安局的造反派一起夺了公安局的权，且得到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全力支持。政法公社虽然夺了权，但并不具备领导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能力。此事后来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北京市公安局遂于2月11日实行了军事管制。

重要的是北京市一级的夺权，对此，卜伟华有这样的记载：

¹ 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5—138页。

² 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第137页。

³ 卜伟华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出版，2008年，第392—399页，下文引用时不再一一列出。

1月18日，有几批造反派先后到北京市委夺权。由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首都职工红色造反总联络站、一机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及北京市委的造反派等组织宣布接管中共北京市委的一切权力。1月20日，造反派又到北京市人委夺了权。参与1.18夺权的一些组织成立了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

请注意,1.18夺权中有聂元梓的身影吗？夺权者的名单中有北京大学吗？如果有的话,《常文》的作者是一定不会放过的。

1.18夺权发生的时候,中央还没有决定北京市如何夺权,一切都还在探讨之中,所以,1月18日晚,周恩来才作了以下的一番讲话。卜伟华记载:

1月18日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在人民大会堂与北京左派学生、机关干部召开的座谈会上,鼓励学生参加夺权行动。周恩来说:“今晚已有三十多个单位的造反派去(北京市委)夺权了,进驻了市委大楼,祝贺他们夺权的胜利。……北京市范围很广,夺权斗争不能一下子解决。首先要吸收厂、矿职工参加全市职工的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大专院校,特别是综合大学像北大、清华等,对北京市的夺权斗争应多负一些责任。”

周恩来的讲话,对当天的夺权行动是肯定的。也正是周恩来在讲话中要求北大等大学“多负一些责任”,才促使正在军训中的北大参与到北京的夺权斗争中去。1月19日,北大成立了夺权指挥部,由孙蓬一、徐运朴负责。可惜,他们都已辞世,否则,我们可以听听他们的回忆。

响应领袖号召,匆匆忙忙到外面去夺权的行动都是盲目的,很快就碰了壁。如去华北局夺权。据一位校友转述的亲历者的说法,其时华北局正在开会,北大学生去了,宣布夺权,要求所有人员次日早晨8点准时上班,就此而已。很快中央来电话:“这是中央的权,

你们不能夺”，于是就撤出了，前后为时约2个小时。这引来了李雪峰的嘲笑：“两个小时的政变被粉碎了”。

北大红旗兵团、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等多个群众组织去《北京日报》社串连，酝酿夺权。但后来由于林杰、吴传启一伙的干涉，北航、清华、北大等不得不撤出，只有北师大一家留在那里。后来，吴传启成为《北京日报》顾问，学部吴传启一派的涂武生控制了《北京日报》。

北大在夺权问题上真正介入的是教育部夺权，聂元梓也认为，“在校外，北大只是实实在在地参加了这一次夺权。”¹据卜伟华的记载，“1月19日，教育部北京公社在北大红旗兵团等组织的支持下夺了教育部的权。20日，教育部延安公社在师大‘井冈山’等组织的支持下又搞了反夺权。2月2日，两派在教育部发生武斗，数百人被打伤。”这场冲突的焦点主要是对卢正义的看法。卢正义是教育部的司局级干部，文革开始时贴了第一张大字报，成为“左派”，但很快被揭发出来历史上有问题，是叛徒。卢正义是延安公社的头头，北大坚决反对卢正义上台掌权，但他受到关锋、王力、戚本禹、林杰、吴传启和北师大“井冈山”的支持。关锋、王力挑动武斗，并捏造“三路进军”之类的谣言打压北大，迫使北大撤退。关锋、王力欺人太甚，手段卑劣，人们就不得不问个为什么了。聂元梓、孙蓬一由此对中央文革的某些人有了一些认识，北大一些同学，也由此对中央文革有了一些认识，这一切，都给北大的文革进程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卢正义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很快就隐藏起来，并且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直到1970年，公安部还向全国发布通缉令，追捕卢正义，但没有结果。有校友告，关锋、王力垮台后，学部联队头头王恩宇曾确认康生讲过保卢正义的话。由此，有的同学对康生产生了怀疑。康生为什么要发话保卢正义呢？这里头有什么秘密呢？他们要掩盖什么呢？康生是要掩盖自己的问题，还是要掩盖别的什么人的问题呢？

北大参与教育部夺权发生在1月19日，正是对周恩来1月18日讲话的响应。而且，

¹ 《聂元梓回忆录》，第199页。

北大是教育部系统的，教育部当时又被认为是一个“烂掉”的单位。北大参与教育部夺权，无非是支持那里的造反派组织搞文革运动而已，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再说北京市一级的夺权。《常文》写道：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对聂元梓等人提出的成立《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的行动并没有表示承认和支持，而是派了身为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来主持北京市革委会的筹备和建立。据《首都红卫兵》2月18日报导：谢富治副总理亲自抓北京市的大联合，大夺权，他于1967年2月6日下午，接见三个司令部的工作人员，表示支持三个司令部联合，成立“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

《常文》这一段话想要说明什么问题呢？是想要说明聂元梓要“抢夺北京市的大权”，而毛泽东不准吗？或者是想要说明聂元梓要抢谢富治的权呢？另外，按照《常文》的说法，北京市似乎只有聂元梓等人提出成立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只此一家，而没有别的夺权组织。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吗？

这一段话表明，《常文》的作者，对北京市夺权的情况其实是很不了解的。

据卜伟华研究，在北京市的夺权中，出现了多个全市性夺权筹备组织，卜伟华在书中列出名称的，就有7个之多，聂元梓参与的那个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只是其中的一个。这些组织，谁也没有能力承担起北京市的夺权任务，中央一个也没有承认，但也没有否认。

北京市各群众组织的夺权运动，被卜伟华称为“各行其是的夺权”，乱乱纷纷，要到毛泽东干预之后，形势才明朗起来。同《常文》的重点不同，卜伟华的说法是：“毛泽东对北京市的夺权早有考虑。他没有让在造反派中呼声很高的戚本禹来领导北京市的夺权，而是点名叫谢富治、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主持筹备北京市的夺权。”

我们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北京市夺权问题的关键和要害，并不是聂元梓想要篡权，更不是聂元梓想要篡夺谢富治的权，而是戚本禹想要攫取这一权力。在中央讨论

北京市夺权问题的某个会议上，戚本禹自告奋勇说“我去”。这件事是江青于1970年1月在同周恩来、康生等一起接见中央直属系统多个单位军宣队代表时说的，许多单位都传达过。一位校友就听过这一传达，对此记忆深刻。所谓“在造反派中呼声很高”，据卜伟华书所载，其实就是北师大“井冈山”和学部联队等组织在民族文化宫开会，策划夺权事宜。会后，以北师大“井冈山”和学部联队的名义，向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建议信，建议迅速成立以戚本禹为总指挥的“北京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来领导北京市的夺权。

北师大“井冈山”和学部联队联名上书，是同戚本禹的自告奋勇相配合的。

如果戚本禹是个真正的革命家，倒也罢了。群众组织向中央文革联名上书，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他们搞的是秘密活动，且其中有一伙坏人结党营私，借机阴谋夺权，问题就严重了。毛泽东可以不让戚本禹领导夺权，但不会不让戚本禹参与其事，何况谢富治和戚本禹早就勾结在一起了呢。其结果，如吴德晚年在回忆录中所说的：

（北京市革委会）新进来的人大都是王、关、戚支持的学部的那一派，约二十多人。哲学所的造反派头头周景芳担任了市革委会的秘书长，杨远担任了办事组组长。办事组等于是市委的办公厅，一切机要都由杨远控制了。……革委会成立后《北京日报》恢复出版，学部派来的涂武生控制了《北京日报》，实际上，真正控制的是吴传启，吴传启背后操纵涂武生，所有的社论、消息，都要经过吴传启看过。¹

对此，谢富治应该负什么责任呢？谢富治是受蒙蔽的？或者，他们本来就是同伙？

卜伟华的书中有的一段引人注意的话（见该书第611页），现抄录如下：

陈伯达曾向毛泽东送过关于同王力、关锋、戚本禹有关系的一些人秘密开会，策划掌握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力的材料。毛泽东对陈伯达也讲过，北京市是让一派操纵了，但

¹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第36—37页。

这个问题很复杂。并点了关锋、吴传启、林聿时三个人的名字。当时，毛泽东说，对们的问题要慢慢来。

卜伟华没有说明这一材料的来源，我们无法得知毛泽东于何时何地同陈伯达说了这一番话，其详情若何。陈伯达向毛泽东报送材料，似应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之前。从毛泽东谈话内容看，毛是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之后说的这句话，毛泽东已经看清楚，“北京市是让一派操纵了”。近来从网上看到吴德 1970 年 1 月 11 日的讲话：“他们（指周景芳一伙——引者）在市革委和在学校安插一帮人。陈伯达同志告诉我，你们被控制了，我们还不了解情况。”¹ 吴德是北京市革委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任，连他都不知道自己被架空了，听到陈伯达的提醒还一脸茫然，可见北京市“让一派操纵了”的情况有多么严重。

从上引卜伟华书中的记载来看，毛泽东对关锋、吴传启、林聿时那个小团伙的事，也是一清二楚的，毛泽东本打算“对们的问题要慢慢来”。但是，这个小团伙急于夺权，很快就暴露了自己的野心，让革命群众抓住了狐狸尾巴。另外，他们表现得非常猖狂，已经到了危害党和国家利益的地步。最后，毛泽东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一句话就让他们完蛋了。

《常文》提到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并且拿它的倡议书来说事。因此，笔者觉得有必要对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的始末作一简要回顾，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上文已经提到，早在 1 月 18 日，“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简称“夺委会”），就已经夺了北京市政府的大权。网名“万一巨二”的作者新浪博客上以《疯狂的年代，历史的一页》为题，发表了 8 篇文字，对“夺委会”的始末有较详细的介绍。据该博文，“夺委会”组建了核心小组，发表了夺权宣言，接管了各办。“夺委会”得到周恩来的赞许，但中央对其未予承认，也没有否认，而是作为一个过渡的临时政权保留下来

¹ 《1970 年 1 月 11 日，吴德在北京市举办的局县区级学习班上的讲话》，见宣讲家网，<http://www.71.cn/2012/0410/513855.shtml> 2016.2.29。

了。在北京市各夺权组织中，唯有“夺委会”是实际掌有权力的，执政时间为1967年1月18日至4月20日。为了搞大联合，“夺委会”组织了“大联合谈判团”，由北航“红旗”的方臣任团长。后来，这个谈判团实际上取代了“夺委会”核心组，由方臣主持工作。

1

据卜伟华记载，1月22日，北航“红旗”为争得在北京市夺权的有利地位，扣押了北京市委负责人吴德。当天陈伯达、江青给北航“红旗”打电话，除要求立即释放吴德外，还提到“考虑准备北京市工农兵和革命师生代表大会，组织市人民政府”的设想。1月24日，陈伯达接见北大、北航等校造反派时说：“建议你们工农兵学商开个临时联席会，筹备一个比较大的范围的工农兵学商的代表会议。”1月26日，陈伯达、江青等接见北京高校造反派时，陈伯达又提出：“跟同志们商量一下，搞一个工农代表大会……你们看条件成熟不成熟？”江青的讲话则强调了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联合，“不要让别人以为三个司令部不起作用了”。

笔者以为，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的成立，正是对陈伯达、江青有关讲话的响应。

北京革命造反公社是聂元梓和一些单位联合发起的，于1月27日发表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倡议书》，提出“迅速召开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从走资派及一小撮顽固推行反动路线的家伙手里全面地夺回北京市的领导权。”《倡议书》上列名的发起单位有30个，包括北大校文革、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大学和若干工厂的群众组织。卜伟华称发起单位有二百多个，可能是包括了后来的参加者。《倡议书》的内容，同当时类似文告相似，且需发起单位一致通过，并公诸于世，不存在什么可供挑剔的阴谋。

¹ 万一巨二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973d010100qj60.html 《疯狂的年代，历史的一页》，之一：“激战前夜”（2010.04.07）；之二：错失良机（2011.05.05）；之三：大联合谈判团（2011.05.06）；之四：谈判与事件（2011.05.10）；之五：制止武斗，清理市府（2011.05.11）；之六：北京抓革命，促春耕誓师大会（2011.05.12）；之七：吴德、刘建勋亮相（2011.05.13）；之八：夺委会总结大会（2011.05.14）。

至1月下旬，北京市除了“夺委会”外，还有6个大的全市性夺权筹备组织。这些组织，都是紧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响应中央号召而产生的。卜伟华指出，“因为北京是首都，谁都不知道具体该怎么样夺权，也一直未得到中央关于北京市夺权的具体指示，暂时还未敢轻举妄动。”笔者以为，所谓“未敢轻举妄动”，就是没有实际的夺权行动。这也是聂元梓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只联合，不夺权”。

毛泽东在1月份的时候对北京市夺权有什么具体指示，笔者尚未查到。但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王力反思录》称：“这是毛泽东夺权思想的纲领性文件，是根据主席历次在常委会上谈的和个别谈的话整理的。……北京公社宣言，文件中也讲了。而且主席要江青提北京公社的名单。……成立北京公社，名单中提了些什么人，是江青与关锋商量的，总理不在场。他们提由党校李广文负责，文革成员戚本禹参加领导班子，夺北京新市委的权。主席不同意李广文，说要谢富治负责。”¹显然，这是1月底的事情。

据卜伟华，2月1日，戚本禹在接见北京高校造反派时说：“最近正在考虑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北京人民公社’，中央有这个意思，要进行筹备，要按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它。现在中央文革在讨论，由谢副总理负责。谢副总理是各部第一个支持左派的，他首先支持了‘政法公社’，他在左派组织中有崇高的威望。傅崇碧、李震来筹备。”这大概是第一次公开宣布由谢富治来领导北京市夺权，也是第一次公开提出“北京人民公社”这个名称。谢富治出面接见北京各界群众组织并谈北京市大联合和夺权问题，都是从2月份开始的。

对戚本禹2.1讲话中传达的中央的意思，北京革命造反公社显然是拥护并且紧跟的。当天晚上，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与“夺委会”进行了协商，达成五点协议，要联合起来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筹委会。北大《动态报》1967年2月3日对此有过报道。但此事很快因观点分歧而作废。

2月6日，地质“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等组织宣布退出北京革命造反公社。

¹ 《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香港，2001年，第970页。

有退出的，也有来合作的。2月7日，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同另外两个夺权组织联合，成立了新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7个主要夺权组织中有3个联合起来了，应该说，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在联合方面是有成效的，并且很快同“夺委会”达成了新的协议。

2月9日，谢富治向北京红卫兵谈大联合的夺权问题时说：“北京市大联合的道路是工人搞工人，学生搞学生，农民搞农民，然后大联合。”这就是先成立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再搞大联合的思路。

2月10日，谢富治在一次讲话中强调了“夺权要三结合”。北大《动态报》1967年2月14日第56期登载了“谢富治副总理讲话要点”。

十日下午二点，谢富治副总理在人大会堂接见了首都大专院校各革命造反派，并作了重要讲话，内容如下：

各校到外地的人（包括派出到各地的联络站）都要回来，整风、整顿思想。首都的夺权到了关键时刻，它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但现在还没有建立统一的组织。北京应该搞一个工农兵学的筹备小组，中央文革支持。夺权要三结合（即群众革命造反派、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政负责人、军队负责人），大专院校选20名代表参加筹备小组，两三天就搞出来。

关于夺权以后新机构的名称，也有了变化。据卜伟华，谢富治在2月10日的讲话中说：“……上海有个公社，北京就不一定叫公社，现在还是叫革命委员会。”

“万一巨二”的博文称，“当时中央是希望聂元梓等组建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也合并到夺委会来，相对统一，维持局面，给革委会筹备工作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待革委会成立后即可取而代之。”据该博文，1967年2月上旬某日，谢富治将聂元梓和“夺委会”负责人方臣都叫到了人民大会堂，让他们谈判解决大联合问题，双方最后达成了一致。谢富治听取了他们的谈判汇报后，比较满意。博文写道：“事后聂也去过夺委会，也参加了

夺委会组织的如抓革命促春耕誓师大会等活动。”

在谢富治督导下，聂元梓同方臣的谈判获得成功，并很快得到落实。卜伟华的书中有以下记载：

根据谢富治的讲话精神，2月13日，北京“夺权斗争委员会”和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达成四条协议：

按系统组织代表（工人、学生）；

北京夺权斗争委员会保持现状；

学生由一、二、三司等组成红卫兵代表大会领导，凡参加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的一律撤出；

由三个工人组织和北京革命造反公社派一个工人组织组成四人小组，负责召集工人讨论筹备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

应该指出，这是北京市群众夺权运动走向按系统联合——建立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建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重要一步。

2月22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聂元梓奉命任核心组组长，此后有不少时间要花在这项工作上。

1967年3月1日，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宣告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即将结束活动。1967年3月3日北大《动态报》报道：

3月1日《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红代会工农兵联络站》发表联合声明：……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必须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三结合”，否则夺权就是一句空话。……《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红代会工农兵联络站》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明确指出它是革命派大联合的过渡组织。它适应北京革命派大联合的形

势而产生，为实现全市的大联合作出自己的努力。根据当前形势的要求，我们自己在所属的单位积极进行按系统、按部门的联合，目前这项工作已基本告成，因此我们也就完成其历史使命，即将结束活动。

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的最后活动是3月7日的大会。1967年3月8日北大《动态报》对此作了报道：

《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分系统大联合誓师大会胜利召开

三月七日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在展览馆剧场举行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分系统大联合誓师大会，这是一个革命的大会，是一个促进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大会。姚进同志说：北京造反公社的诞生目的是为了北京市革命造反派分系统的大联合，就是为了促进《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的迅速召开，为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全面夺取北京市的领导权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所要促成的是一个巴黎公社式的、自下而上的、工农兵学商各基层单位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只是促成这种大联合以前的一种临时性的过渡组织形式……

从以上记载不难看出：第一，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只是响应中央号召、为联合夺权成立的一个临时性的组织，没有夺权的实际行动，没有掌握过任何实际权力；第二，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从成立到结束，都是尽力紧跟中央、按中央的精神去做的，在搞大联合方面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聂元梓除了参与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的事情外，还受命参与筹备红代会的工作，但具体时间有待考查。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提到了她在“一月夺权”时的经历和心态。¹她已经不记得北京革

¹ 《聂元梓回忆录》，第195—199页。

命造反公社这个名称，但对当时“只联合，不夺权”这个想法记得很清楚。她回忆说：“从门面上看，我们有多少多少组织，有多少多少人，搞得声势很大，实际上都是空的，没有什么具体行动，所以也就没犯什么大错误。……在如何夺权的问题上，我就有自己的考虑，这也影响到北大的学生，对夺权运动参加的比较少。”笔者以为，聂元梓的回忆是符合实际的，她当时谨慎小心的做法，也是可取的。

谢富治2月份才出面主持北京市的夺权工作，北京革命造反公社1月份就成立了，后来对谢富治的工作也是支持的。所以，根本不存在聂元梓发起成立北京革命造反公社是想夺谢富治权的问题。类似情况还有韩爱晶。以北航“红旗”为主体的“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1月中旬就夺了市政府的权，且一度行使职能，但并没有人指责韩爱晶要夺谢富治的权。

聂元梓并没有篡夺北京市权力的野心，她没有这个水平，也没有这个力量。谢富治是老革命，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在文革中又积极追随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冲锋陷阵，堪称是同级官员中的“红卫兵”，深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信任。聂元梓开始时对谢富治是支持的。对谢富治有看法，还是后来的事，有一个过程。说聂元梓反对谢富治就是想当北京市革委会主任，那是欲加之罪，无稽之谈。但是，聂元梓是市革委会副主任，处在这个位置上，她对于市革委会许多重要部门被吴传启一伙所把持的情况，必然会有所察觉。聂元梓看出其中有问题，她没有选择同流合污，也没有默不作声，而是向中央举报，并以实际行动加以反对了。而这，不仅需要眼力，也需要勇气，最后还要付出代价。关锋、戚本禹和吴传启一伙自己操纵了北京市革委会，却要贼喊捉贼，倒打一耙，谁要怀疑他们，谁要揭露和反对他们，就会被扣上“反对谢副总理”、“反对新生的革委会”、“自己想当市革委会主任”等大帽子，就会受到打击报复。■

【评论】

我们最后的责任

——答常风先生

章铎

前言

《记忆》143期刊登了常风先生的大作《应该客观、真实、全面地还原历史真相和评价人物——评章铎女士的文章〈我所了解的孙蓬一〉》（以下简称《常文》），拜读之后，感到有必要再作一点说明。

拙文《我所了解的孙蓬一》，是根据笔者在文革中的个人经历和对孙蓬一的了解而写成的。个人的见闻当然有限，但我一直认为，孙蓬一的问题是一个冤案，对孙蓬一的做法是不公平的。《记忆》120期刊登了郑仲兵先生的访谈，第一次为孙蓬一说了些公道话。受郑先生这篇访谈的启发，笔者认为自己也应该把所了解的孙蓬一的遭遇写出来，希望有助于世人了解相关真相。

《常文》说：“作者完全站在同情孙蓬一的立场上，引用的资料基本是对孙蓬一有利的，所以文章的结论是片面的，不真实的。”但是，他并没有具体指出拙文有哪些地方不符合事实。他只是说了“孙蓬一在文革中犯下了许多严重的错误”等等。而他所说的“事实”，很多是经不起推敲的。

常风先生声称“本人是北大文革的亲历者，见证了北大文革三年多的历程”，似乎他对北大文革非常了解，并且有着三年多时间的不间断的“见证”。但从他所发表的多篇文章中，看不出他在文革中到底做了些什么，亲历过什么，又见证了什么。实际上，他对北大文革的许多事情是不了解的，就连北大井冈山兵团的情况，也没有见他提供过什么有价值的史

料。不知常风先生能否写一篇《我所了解的牛辉林》或者类似的文章，为我们了解这些风云人物当年的思想经历提供一些切切实实的材料，或者，常风先生可以发表自己当年所写的文字，来介绍他对北大文革三年多历程的“见证”。

下面，笔者就《常文》提到的部分问题，再作一点探讨。

一、关于攻击、反对邓小平同志，打击迫害邓朴方

《常文》写到：孙蓬一没有赶上在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签字，在1966年11月8日，由聂元梓、孙蓬一等11人署名，贴出了《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大字报说：“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三个月后，聂元梓、孙蓬一等人于1966年11月8日贴出了《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在当时的形势下，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并不是特别耸人听闻的一件事情。胡宗式先生在这张大字报贴出后，曾问过聂元梓：“为什么不贴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的大字报，而贴第二号走资派的大字报？”聂元梓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态度较好，邓小平的态度不好。我们写大字报轰一下他。”

打倒刘、邓，是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主张，是形势使然。我不知道经历过文革的人，除了像张志新烈士那样的先觉者外，谁没有喊过打倒刘、邓的口号？！现在看来，《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是极左思想的产物，是不对的，但不是罪。

《常文》还写到：在校文革主办的校刊《新北大》上，连篇累牍的刊登了多篇丑化、攻击邓小平同志的文章。言外之意，常风先生和他所在的组织，当时是反对这样做的。这显然与事实相距甚远。我曾看到过一本《恶贯满盈的老反革命——邓小平反革命罪行调查报告选》的小册子，32开本，约有1公分厚，蓝色封面，署名“新北大井冈山”。网络上

可以查到这本书。见下图：



图一（截图）最后一行是北大井冈山出版的此书

北大井冈山兵团出版的《新北大报》¹1967年7月26日刊载的《揪陶联合宣言》中有如下文字：陶铸，竖起你的狗耳朵听着，立即滚出中南海听候红卫兵及广大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我们坚定的揪陶战士，高歌“饥餐刘邓头，渴饮陶铸血！”奔赴战场，奋勇向前！



“揪陶联合宣言”，其署名最前面的几个单位就是：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新北大红旗飘、新北大北京公社、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新北大井冈山公社。这五个组织不久后联合组成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

文革中，像上面这样“连篇累牍”地攻击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的语

（图二：《新北大报》1967年7月26日刊载的《揪陶联合宣言》）言，到处可见，它不是哪一家、哪一个派别独有的。现在回忆和总结文革，本不应拿出这样的东西再来说事。我被常风先生所迫，就是想提醒一下他，不要太健忘了。

¹ 《新北大报》1967年7月12日创刊，由新北大红旗飘、新北大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等组织联合编辑。

至于邓朴方跳楼致残，说法太多。好在邓朴方还健在，真相还是由他自己去说吧。邓朴方的受伤致残，对于他和他的家人是一个巨大的伤痛，笔者也为之惋惜。常风先生说：“邓朴方跳楼是被逼的”。是谁逼的？和聂元梓、孙蓬一有什么直接关系？说话要有证据！

《常文》写到：“聂元梓和孙蓬一犯下的这个错误（攻击、反对邓小平同志，打击迫害邓朴方）可以说是在他们所有的错误中最致命的，也是导致他们在文革后被判刑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如阮铭 1977 年对孙蓬一说的：‘邓小平要出来，第一个就要拿你这样的人开刀！’”

这里，常风先生说了些与事实比较接近的话；但是，他在引用阮铭与孙蓬一的对话时，却是断章取义。这段对话的场景应该是这样的：文革后期，工军宣队进校后，他一直挨整。那时候，我们偷偷见过面。大概到了“四人帮”垮台不久，那是天安门事件一周年（1977年），他还没有被解放，他从劳改的地方跑出来，先到天安门广场，再到我家。我们一起去看看阮铭，他（到阮铭家）就跟阮铭说，我真希望邓小平能够早一天出来工作。阮铭挺冷静的，就说：“邓小平要出来，第一个就要拿你这样的人开刀！”**当时孙蓬一霍的一下子站起来，说：“即便是这样，为了党、国家、民族的大局，我也在所不惜！”**¹

常风先生明明读过《记忆》120期关于对郑仲兵先生的访谈，却有意删去孙蓬一回应阮铭的话（上述黑体字部分）。显然，这与他自己所说的“应该客观、真实、全面地还原历史真相和评价人物”大相径庭。

“四人帮”倒台后，孙蓬一欣喜若狂，对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事实上，到了1977年，孙蓬一对自己在文革中追随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起来造反，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衷心支持邓小平上台，即使自己被开刀、倒霉，也认了。与孙蓬一相识较长时间的一位学友告诉笔者：“一次我和另几个人在郑仲兵家相聚，孙蓬一慷慨激昂地称赞邓小平，并想见邓。我说：‘邓不会原谅你，你是自投罗网！’他马上站起来，愤怒痛斥我以狭隘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估量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断言邓小平决不会像我说的那样没有胸怀。还说，即便我倒霉，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局，也在所不惜！”

¹ 《记忆》120期专稿，戴为伟整理：《郑仲兵口述——北大文革片段》，第8页

二、关于炮打谢富治

《常文》写到：至于孙蓬一1967年4月12日在北大全校大会上炮打谢富治，称谢是“摘桃派”，也不过是认为聂元梓是第一造反派领袖，理应成为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不想被谢富治抢走了北京市一把手的交椅，又认为谢富治支持地派，和自己作对，情急之下口无遮拦，才喊出了“炮打谢富治”的口号。

《常文》的这段话，在时间和内容上都与事实不符。首先，北大炮打谢富治，发生在1967年4月13日，而不是12日。再者，从未听到聂元梓或孙蓬一说过谢富治是“摘桃派”。这应该是作者的发明创造。拙文《我所了解的孙蓬一》中清楚地记载了1967年4月12日晚上的大会和孙蓬一的讲话内容。孙蓬一说：“在我看来，这一股势力的代表，这一股势力的核心不在学校，而是在一些机关，是真正的摘桃派，那是一些什么人？如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一帮子人，如高教部的延安公社，中央统战部红色联络站。”

1967年4月13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红代会核心组开会，解决北大和地质等校的矛盾。明明是地质等校打上门来，谢富治不让北大发言，却武断地说“武斗是北大挑起的”，这引起了参加会议的聂、孙等人的不满。当天晚上，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来北大，就“4.11事件”表示声援。在大饭厅，自发地聚集了不少北大同学。孙蓬一的即席讲话，使得参加会议的群众十分激愤，新北大公社总部组织人要到公安部和谢富治辩论，有些人先跑出去贴了谢富治的大标语。但孙蓬一从来没有喊过“炮打谢富治”的口号。常风先生说：“孙蓬一情急之下口无遮拦，才喊出了‘炮打谢富治’的口号”——纯属瞎掰。

“聂元梓反谢是想当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这句话的发明权是属于江青的。1967年4月14日在中央首长接见红代会代表的会议上，江青说：“说穿了，打倒谢富治，你聂元梓当市革委会主任。”《常文》只不过学舌罢了。

文革中，北京的高校发生反谢富治的事件共有四次。第一次是在1966年批判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时期。文革开始时，上级机关向各高校派工作组以领导文化革命，但工作组无例外地都执行了刘少奇的路线。在批判工作组时，各校群众纷纷上揪工作组的派出者，绝大多数派出者都受到冲击。北京政法学院的工作组是谢富治派出的，政法学院的一个组织也要揪谢富治，却遭到政法系统其它一些单位的打砸。

第二次反谢富治，是民族学院的红卫兵总部。1967年1月15日统战部的刘郢、学部的洪涛，带领一些人抢劫了政协和统战部的档案。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反对他们的行动，将洪涛、刘郢抓到公安部。但第二天公安部就把这两个人放了，并发表了公安部某负责人谈话，称这两个人是左派。洪涛等把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郑仲兵，以迫害左派为名送进公安部，公安部将其关押了十多天。谢富治如此颠倒是非的处理“1.15事件”，激发了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的极大反谢情绪。以聂元梓、孙蓬一为代表的北大人，在“1.15事件”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地站在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即后来的抗大公社）的一边。“1.15事件”也是北大对谢富治怀疑的起点。

第三次是就是前面提到的4.13炮打谢富治事件。事件发生的当晚，聂元梓口头向驻北大的中央文革记者承认错误，并写了书面检查连夜送到中央文革。《常文》说的“后来在江青、陈伯达、康生的批评下，赶快做了检讨”，应是常风先生的杜撰。

第四次是1968年初在北京市高校学习班上，聂元梓掀起的反谢浪潮。这一次有多所院校参加，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的井冈山造反团和清华大学井冈山4.14总部的表现最为抢眼。这次反谢，被中央定性成“为二月逆流翻案”。

文革中有一个怪现象：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除了谢富治以外都可以反；碰了谢富治，就要倒霉。粉碎“四人帮”后，谢富治的许多严重问题也被揭露了。文革过去快50年了，为什么有人还拿江青1967年4月14日的讲话（“说穿了，打倒谢富治，你聂元梓当市革委会主任”）说事呢？！

三、关于“愚忠”

《常文》写到：孙蓬一身上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愚忠色彩，对文革发动者愚忠，对聂元梓愚忠。这种严重的愚忠思想害了他，使他不明是非，紧跟文革发动者和聂元梓，犯下了许多严重错误，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孙蓬一确实对毛泽东愚忠，对周恩来愚忠，拙文《我所了解的孙蓬一》中对此已有清楚的表述。但是，那个时代的人，有几个能不愚忠呢？正像王大宾¹所说的那样“从小学到大学，从家庭到社会，我当时接受的思想教育，也只能是毛主席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史观的教育，是对毛主席个人崇拜的教育。”²

孙蓬一作为聂元梓的主要助手，协助聂元梓做了不少工作，尤其在反对吴传启、反对王力、关锋的斗争中合作得很好。但经历了北大文革的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聂、孙之间经常存在矛盾和斗争。连陈伯达都说过：他（指孙蓬一）不是还反对过聂元梓吗？³

孙月才⁴在《悲歌一曲 文革十年日记》⁵中有如下文字：

（1968年）3月9日 星期六

晚去聂家，聂说现在头脑须要冷静一点，说孙蓬一头脑发热了。这意见是对的。

聂说：“我没法和孙蓬一一起工作，他不能当我的助手。将来让孙蓬一来搞，我到机关去工作。”这是错误的。

北大井冈山兵团1967年8月25日出版的《新北大报》上有一条简讯：孙蓬一已经退隐，孙在临行前与聂大吵了一场，说：“你犯错误是认识问题，我犯错误是认识问题？”

常风先生竟然说“孙蓬一对聂元梓愚忠”，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¹ 王大宾，曾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一把手，毛泽东钦点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

² 《王大宾回忆录》第5、6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2015年10月第一次出版、印刷。

³ 陈伯达1970年4月3日在北大的讲话（摘录），手抄件。

⁴ 孙月才，曾任新北大公社一把手，哲学系研究生。

⁵ 孙月才：《悲歌一曲 文革十年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2页。

四、北大反吴传启的历史不容抹杀

1967年6月5日陈伯达讲话，批评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并特别提到吴传启，他说：“吴传启算什么东西？吴传启你们说过就算了，提不上日程上。他这个人排不上我们社会的位置。”

吴传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贴了第一张大字报，时间是1966年5月23日，题目叫“批判《青春漫语》大毒草，揪出杨述反革命黑帮”。这张大字报比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早两天，标题用词也要厉害得多，吴传启由此成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吴传启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他和关锋等人关系不一般。他们手眼通天，善搞阴谋，手段卑劣，用心叵测，能量很大。北大的人（包括社会上其他单位的许多人士）看不过去，要揭露他们。孙蓬一1967年4月12日讲话，公开揭露了这个团伙的面目，点了其中一些人的名字（吴传启、抢档案的洪涛等），这等于是向他们下了一份宣战书。那时当然不能公开点关锋的名字，但吴传启无疑是关锋的软肋，反吴传启就是揭露关锋的切入口。

吴传启、林聿时等人控制了学部以后，就把手伸向了社会。他们的手在当时已经伸得很长了，或者说，吴传启们的手“被”伸得很长了。别的方面且不说，我们就看吴德讲的北京市革委会受吴传启们控制的情况吧¹：

（北京市革委会）新进来的人大都是王、关、戚支持的学部的那一派，约二十多人。哲学所的造反派头头周景芳担任了市革委会的秘书长，杨远担任了办事组组长。办事组等于是市委的办公厅，一切机要都由杨远控制了。……革委会成立后《北京日报》恢复出版，学部派来的涂武生控制了《北京日报》，实际上，真正控制的是吴传启，吴传启背后操纵涂武生，所有的社论、消息，都要经过吴传启看过。

¹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3年，第36、37页。

尽管吴德说得比较简略，但其中揭露的事实，难道还不够怵目惊心吗？

潘梓年是学部联队结合的老干部，在反对关锋的斗争中把他作为一个靶子。1967年4月中旬以后，北大联合北京市的一些单位，先开始揭发潘梓年。关锋一伙知道北大下一步要搞吴传启了，就想方设法来阻止北大的行动。

1967年5月27日中午，聂元梓接到电话，要求她在两点之前到达钓鱼台，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她谈话。陈伯达说：“我们是受江青委托和你谈话的。……你是有水平的，是市革委会副主任，又是红代会的，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后有许多事情需要和我们共同来做。我们非常希望你合作，你要和我们站在一起。你写的大字报和你在北大校文革的行动，为‘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希望以后好好地合作。你不要反对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¹

显然，陈伯达、关锋和戚本禹一起出动，陈伯达说的话就不是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堂堂中央文革，竟然提出来要和聂元梓做一笔政治交易，这是多么卑鄙而又拙劣的手段，原先满口的马列主义不见了，倒像是黑道大佬软硬兼施地非要谈成一笔交易。

6月1日，北大除隐患战斗队公布了关于吴传启历史问题的第一批材料，如果没有陈伯达的“6.5讲话”，后面还有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但仅仅这第一批材料，就打中了要害，吴传启的后台们坐不住了。他们愤怒了，软的不行，他们要来硬的了，内部谈话不行，他们要采取公开的行动了，于是乎，便有了陈伯达的“6.5讲话”。这篇讲话是要灭火的，用的是釜底抽薪的办法，阻止北大进一步公布材料，把揭露吴传启的行动扼杀在摇篮里。这篇讲话同时也是点火的，在北大校园里点一把火，让北大内部闹起来。与此同时，吴传启这个团伙已经被揭露了，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见不得光的，一旦遭到揭露，吴传启、林聿时只能离京逃亡。他们操控的学部联队不再是铁板一块，内部有人起来造反了，连戚本禹都要在学部内部支持一些人来反对吴传启，以免自己被动。因此，他们的气数也就到头了。

¹ 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219页。

不过，他们覆亡得那么快，倒是让处在陈伯达“6.5讲话”高压下的北大师生未曾料到，陈伯达本人大概也没有想到。

北大井冈山兵团加给聂元梓的罪名：“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分裂中央文革”、“炮打谢富治（聂元梓想当市革委会主任）”、“二月逆流派”，等等，都是当时最唬人的帽子。反对吴传启是要冒风险的，因为他有后台。学部很早就有人揭发吴传启，但都遭到了严厉打击。北大聂、孙敢于当面向江青、陈伯达说关锋、王力结党营私，也是要冒风险的。聂元梓拒绝和中央文革作政治交易，更是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后果。

《常文》说：反潘吴问题，章文和胡宗式的一些文章里，建立了一条这样的逻辑：聂、孙反对潘梓年、吴传启，反潘、吴就是反对王关戚，反王关戚就是反“四人帮”。……。不能说后来吴被关押就证明聂孙是正确的，也不能说吴和关锋熟悉就说反吴就是反关锋，更不能说关锋曾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反关锋就是反中央文革，就是反对“四人帮”。文革中政治关系错综复杂，今天有的人还在台上指手画脚，明天就可能成为阶下囚，后天放出来又重新工作。何况聂、孙等人跑到别的单位插手人家的文革活动，本身就是错误的，反对潘、吴没有什么正当理由。”——以前常风先生说：“不知道什么潘吴”；现在终于在潘吴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常文》还说：1966年底至1967年初，聂元梓、孙蓬一等派人到学部夺权，和反对吴传启的一派组织“红卫兵总队”联合，反对吴传启和潘梓年等。请问常风先生：北大什么时候到学部夺权了？谁去夺权了？

陈伯达的“6.5讲话”，使北大内部大乱，反对校文革的“团、O、飘、井、红”迅速崛起，并于1967年8月17日联合起来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北大井冈山兵团的核心势力，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聂元梓、孙蓬一为首的校文革，要在北大进行“二次革命”、“向资产阶级政客夺权”、“坚决打倒坏人孙蓬一”、“一切权力归井冈山”等等。在王力、关锋倒台的前夕，《新北大报》1967年8月30日的社论，充分体现了井冈山兵团总部要在北大进行“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的意志。下面是这篇社论的全文：

将革命进行到底

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光荣地加入了首都红代会，这是我校及北京市革命与保守两大派势力反复斗争的结果，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它标志着北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政客夺权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北大旧王朝的国家机器并未摧毁。写过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根本不是马列主义者，在革命小将推翻了张承先临时政府以后，正是她抹杀和窃取了小将们的丰功伟绩，取张承先而代之，建立了一个名为红色政权、实则比临时政府更带有欺骗性的资产阶级政府。它网罗与集中了旧北大的一切保守势力，疯狂地扼杀小将的造反精神，完全成了压在成千上万革命群众头上的铁盖子，使北大未能按照主席所揭示的规律去完成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这正是北大运动的症结所在。也就是这个资产阶级政府，疯狂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千方百计地动摇无产阶级专政，颠覆北京市年轻的红色政权，充当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农夺权的代表！时至今日，他们仍盘踞在北大的各个要害部门，还在固守资产阶级阵地，准备“十年八年受孤立”，负隅顽抗。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非彻底砸烂不可！这样的权非夺不可！

我们在北大进行的这场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就是代表全市和全国革命造反派向保守势力夺权！就是为工农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夺权！就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向资产阶级代理人夺权！我们的夺权是天经地义的革命行动！

必须砸烂校文革的资产阶级专政！必须摧垮臭名昭著的新北大公社！

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井冈山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面临的不是一般的对手，在行将垮台之际，她不得不改变惯用的战术，自己退居三线，以最顽固的铁杆保聂派为后备，将所谓“第三种势力”推上第一线，妄图乘此动乱之机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以保存力量，伺机反扑。匆匆溜过北大政治舞台的“6.6”串联会不正是这类角色吗？正告老佛爷：不用再以“无产阶级乞食的布袋”招摇撞骗了！保守派中所谓明智派的“中庸之道”必定

破产！

与聂元梓“分而治之”吗？我们忘不了中国历史上老佛爷“招安”义和团、而又勾结帝国主义一举歼灭之的前车之鉴！更忘不了北大历史上的“井”“红”天真地要求聂元梓合作、然后横遭血腥镇压的沉痛教训！“分权”一说是根本不成立的！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在路线和政权问题上决没有调和的余地！必须丢掉一切幻想，将“倒聂运动”进行到底！必须将一切权力全部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艰巨的战斗任务、光荣的历史使命，正在召唤着英雄的井冈山人，让我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

上面这些说明北大井冈山兵团当年所作所为的材料，我本不想写，因为写孙蓬一不一定要牵扯这么多。既然常风先生说“要客观、真实、全面地还原历史真相”，所以我在本文中补充一些事实，尽量做到“客观、真实、全面”。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持续十年之久的运动，给我们的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现在看来，当年北大的广大师生员工，包括聂元梓、孙蓬一、牛辉林、侯汉清等人，从内心都是想跟随毛泽东、党中央搞好文化大革命的。但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都程度不同地干了些荒唐事。文革过去近五十年了，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有责任把当时的历史事实讲清楚，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资料。这是我们最后的责任了。■

2016年3月6日定稿

【述 往】

我的人事档案

俞小平

我们中国人，凡是能喘气的就有一份人事档案，在这个人的工作单位的人事部门的档案室里藏着，轻易不让档案本主看到，大多数人压根儿一辈子都没见过自己的人事档案。虽然一个人见不到自己的档案，可这档案里的文字却决定着这个人的生死荣辱，让人不由自主地想：我的档案里关于我到底写了些什么呀？而我，居然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亲手打开了我自己的档案袋，读到了我的档案内容。你会问，这怎么可能？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

1970年3月，我从北大分配到山西省繁峙县工作，繁峙县的领导又把我分配到县水泥厂，我就算在繁峙扎下根了。我人到了哪里，我的人事档案也就会跟到哪里。不过虽然我在水泥厂工作，我的人事档案却只能静悄悄地待在县人事科的档案室里。因此当命运光顾我，给了我一个离开这个位于山西北部山区乡间农田之中的小水泥厂的机会回到北京时，我需要让我在县人事科档案室里的档案调到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人事部的档案室；在掌握人事大权的干部审阅了我的档案后，才能决定我是否有足够的幸运中这份大彩。

我在北京的亲属偶然之中发现，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正在大规模扩建中，那时技术人员不足调用。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的领导们把头脑动到了我们这些在文革中被胡乱分配的老五届大学生的头上。总厂的方案上报燃料化学工业部批准后，国务院下令北京市给总厂500个户口名额，总厂就撒开网在全国各地捞人了。我的亲属得到这个消息，加快步伐为我和我的妻子提出申请，申请终于被批准。

那时一个人倘若想要调动工作，首先要本单位肯放人走，然后才谈得上有单位肯接收。我在繁峙县上上下下跑了多次，终于得到本厂领导的首肯，然后又得到县工业局的放行，

县领导的批准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各级领导虽然不太想让我调离，可也没有过于留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晋北地区山地纵横，交通不便，本地人大都觉得热土难舍，不愿离乡。我这样的外地人到他们那里工作，本地人都觉得不易。将心比心，对我也就不为己甚了。

当我的亲属告诉我，石化总厂已经向繁峙县发出商调函时，我就在水泥厂怀着莫大的期望等着县人事科把我的档案发出，那样我的调动的事就可说是八字有了一撇了。可是就在这时的一天下午，人事科的一个科员打了个电话来，说是“你的档案找不着了！”我一听头就大了，冲着电话结结巴巴地大喊“怎么会找不着了！”这不是要人命吗？那个科员连说，“别急别急，我还在找。”缓了一缓又说，“你也可以来帮我找。”我说好，明天我去县城。

第二天一大早，我坐上长途汽车，赶了60里路到县城。繁峙县县委会和县革委会位于繁峙老城外西边的一个大院里，建筑都是一排排的平房，当地称为排房。我到了人事科，那个科员看见我来了，就说他正忙着呢，我可以自己去档案室找我的档案，说完就把我带到隔壁的档案室，开了锁打开门让我进去。这可是真叫奇怪了：我要进机密的人事档案室去找我自己的档案！不怕我泄密吗？安排完了，他就匆匆地回到隔壁办公室去办他的事了。

档案室里从外到里有三排高大的档案柜，柜里面整齐地立插着一个个的牛皮纸档案袋。本地干部和下放干部的档案都排在一起。有的薄有的厚，封皮上写着档案主人的名字。薄的看样子只有几页；厚的是几个塞得满满的档案袋捆在一起，看样子就知道是“老运动员”了，每经历一次政治运动就加一个档案袋。我照着科员的指导，从最左边档案柜的左上角开始，一个一个地检查档案袋上名字，看是不是我的。第一行查完了，第二行查完了，最后一行查完了，未发现我的档案。我开始查第二个柜，然后第三个，第四个，没有。到了中午，我出去吃了午饭，回来接着干。看到那科员走进档案室来看我的工作，我问他要是找不到我的档案怎么办？他说那就得重新发文调查建档。我想那可是糟透了，重新建档那得花多少精力多长时间？等到我的档案重建了，我的调动可就黄瓜菜都凉了。我心里滋长出厌烦和不耐，开始查第二排。档案袋薄的，自然是没出过事的；有些人的档案袋厚达几寸，不知道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折腾了多少遍，受过多少苦难和屈辱。查完了第二排，还

是没有发现我的档案，我估计已经翻了大约 1500 份档案。我又到隔壁办公室告诉那个科员，都找过了，还是没有。那科员说，你们分配来的几十个大学生的档案都在后面第三排档案柜里。啊?? 你怎么不早说? 我顾不得跟他理论，又回到档案室。走到第三排柜跟前，那里面黑黢黢的，柜里几乎都是空的。隐约看到中间一行有几十个档案袋排在一起，果然都是我们这些大学生的档案，包括北大跟我一起分配来的两个同学的。这些档案袋一个个都很薄，一望而知里面没有几页纸，可还是没有我的。我矮下身子往后看，里面黑黢黢的什么都看不见。还没想好该怎么办，我突然伸手到这一排大学生档案袋的后边。我感觉摸到了一个纸袋，掏出来一看，封皮上正好就是我的大名! 我可高兴坏了，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档案! 我把我的档案袋拿出来放在桌上，跑到隔壁告诉那个科员我找到了。那科员也高兴地说，“找到了就好，也免了我们好多麻烦，我跟科长汇报一下，填好表就给你把档案发出去。”说完他走出去办事。

我返身回去看着我的档案袋，心里忽然起了“歹念”：既然现在这里没人，我为什么不看看我的档案袋里到底塞了些什么? 看看四下无人，我赶快打开档案袋，抽出了里面几份薄薄的文件。有我进北大的第一份登记表，南京的中学转来的共青团团员登记表，两三份学期期终总结，然后我看到了最重要的一份文件：北大毕业生登记表。表的大部分内容是我自己填的。“班级鉴定”一栏，写的是我在班上的鉴定，都是好话，也跟我见过面，下面是班长梁正路的签名。最后一栏是“系分配领导小组意见”，这才是我最想看到、而从来不知道的内容。系分配领导小组写了以下三句话：

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表现一般；

能暴露思想，要加强思想改造；

劳动不积极。

读完这三行字，我赶紧把文件放回档案袋，然后坐下来生气。我生气不是为了第一句，说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那是真话，我没意见；说我“表现一般”，没关系，我都“反革命集团外围”了，说我“表现一般”是客气，我不抱怨。我生气也不是为了第二句，北

大出来的都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教出来的臭老九，谁不要改造？我生气的是第三句：“劳动不积极”。我自小体弱多病，形同麻杆，到大学毕业，一米七八的高个儿，只有120斤重。干活的时候，身体壮的同学使八分力，我得使十二分的力才能赶得上。在汉中分校修护坡，我和洪老瘦两人抬石头抬断了扁担，还要怎的？这些王八蛋的工宣队！

生气自生气，找到了我的档案我还是很高兴的。等到那科员回来，收起我的档案袋，我谢了他，转身去赶长途汽车回水泥厂，走起路来只觉得脚下生风。

几个月后，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的调令到了，我终于在1973年12月，拿着调令，带着我的仅有的家当——两个木箱、一个皮箱离开了我工作、生活了三年多的繁峙县，回到了阔别四年的北京。我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事情算是了了，可是想起这件事心里就觉得怪怪的：大学生的档案一起放在最后边，那科员明知此事，为什么让我从前面第一个柜查起？我的档案怎么会掉在别人的档案后面的？谁在琢磨我的档案？一直想不明白。多年以后，见了一些行贿受贿的事，有一天忽然心中突然豁然开朗：那科员是要我向行贿！那时的行贿，大概也就是一条烟，两瓶酒而已。我这个榆木脑袋，也太不开窍了。那时政治运动虽然残酷，经济上还是清明的，当权者还不怎么敢公开索贿，暗示而已。你不给，他也就算了，不敢搞得太厉害。幸亏我脑子糊涂一根筋，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也就没有犯“腐蚀干部”的错误。

我在燕山石化工作了九年，又调到冶金部建筑研究总院，在那里工作了7年，直到我移居美国。现在我的人事档案应该还待在建研院的人事档案室里。也许在我看了我的档案以后，那里面又塞进了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内容。如今不管那里面写了什么，都跟我毫不相干了。我终于摆脱了中共人事机密档案制度对我的控制。■

【述 往】

曾经的岁月

——山东寿光炮兵农场的再教育

刘 若

一、喜儿——死儿

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们被推迟一年毕业分配，虽然分到北京某工厂，却要到山东寿光炮兵农场报到，在那里进行劳动锻炼，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这里集中了清华、北大、北工大、北京外贸学院、哈军工等十几个院校的一百多位学生。

我们住的营房里没有桌子，床是上下两层大连铺。一天干完活，晚饭后，各自干着自己的事，有的写信，有的缝衣服。不一会，学生连连长和指导员来到营房，对大家说：“今天晚上山东农民话剧团来演出《白毛女》，大家准备去看演出吧。”

同学们习惯地放下自己手里的活，准备出发。坐在上铺的我对着下边站着的首长说：



上图：山东炮兵农场女生排

“连长、指导员，我想请示一下。”

“你说吧。”连长说。

“《白毛女》无论是电影、话剧、歌剧，还是芭蕾舞，我在北京都看过好多遍了，这次是不是可以不去？如果可以，我就不去了，我想利用这个

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如果不可以，那我就去。”全排的人都停下来，一动不动，静候着首长回答。连长、指导员半天没说话，这十几平方米的营房里凝固了十几秒钟。突然，北京外贸学院的张华站了起来，说：“连长，指导员，我觉得应该去看演出。样板戏是最好的教材，看一次受一次教育，尤其是贫下中农的演出更应该去看。为什么我们大学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什么不去看样板戏，而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想解放军战士绝不会这样，这正说明我们应该接受再教育。”

她刚说完，连长便说：“大家准备集合，去看演出。”指导员跟着说：“大家要向张华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

同学们一声不吭，提起小马扎儿，乖乖地走出营房。我二话没有，下床，穿鞋，跟着去排队。我们列队走了半个多小时来到演出现场，刚坐定演出就开始了，不一会下起了小雨。大家看看指导员、连长、排长，腰板儿挺得直直的，头发湿了，脸上滴了水点儿都不擦一下。我们私下交头接耳，看来即便是倾盆大雨也得看下去了。

演员满口山东话，根本听不懂。不过有一个台词不但听懂了，还引出笑话。大春一出场便冲着喜儿叫了一声，“死——儿！”台下学生们“呵呵”直笑。开始还有人说：“别笑了，影响不好。”但是后来不但笑声不断，而且有时不等演员开口，台下便像提台词儿一样抢先说：“死——儿，死——儿！”

演出终于结束。个个淋得湿漉漉的，排着队，踏着泥泞的路，回到了学生连营房。队伍一散，其他排的好几个男生，挤着嗓子尖尖地叫着：“死——儿，死——儿！”随之笑声一片。黑暗中，密密的细雨下，100多名的学生连里，“死——儿，死——儿！”此起彼伏。

看看张华，什么表情也没有。

想想喜儿，一定非常不好受。

二、一位不同寻常的政委

刚到农场的第一次排里开会，解放军排长让每人讲讲来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的活思想。全排十八个人，大家讲得千篇一律，都是说开始通知来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想不开，自己努力学习考上大学，学了四、五、六年，毕业了总该有个对口的工作，……怎么也没想到会来农场种水稻。后来听了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后，想通了——然后就是一通表决心。

我始终一言不发，最后排长点名让我也讲讲。

我说：“您是否让我也和她们一样表个态？”

“不是，你怎么想就怎么说吧。”

“那好，我刚一听说毕业后要来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很高兴，因为从小就对解放军非常崇敬，可是始终也没能参上军。现在好了，到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就等于从军了！这辈子也算当上了兵，这好事做梦都没想到。不过说老实话，我也有点不满意，因为是来山东炮兵农场。山东离北京大近了，如果能到新疆或者内蒙军区就好了。”

我说完排长讲了好一阵子话，总之是说我不说老实话，我也没认真听。这种会开过多少年了，总是一个模式。文化大革命，革的就是文化的命。（下图：山东炮兵农场官兵）

大学毕业就成了知识分子，就是臭老九，没完没了地检讨，有啥意思，我都没情绪了。而且我并没有说谎，反倒有看破红尘的感觉。我不仅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

不久出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我们进了学生连就应该算入伍了，大家要求给我们发军装。还真没让我们失望，每人发了一套旧军装。一天我们女生排穿上深浅不一，式样不同的旧军装，排队走过乡间小道。不远处传来孩子们的惊叹语：“快瞧！快瞧！女解放军叔叔！女解放军叔叔！”



当了一把解放军叔叔，女解放军叔叔，好！

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我的这不入流的言行，在连排级的领导中得到的是不信任，而在团级领导那里却恰恰相反。当年的团政委后来见到我时很轻松地提到此事，说完还直笑。而且我每次去团里，这位政委都对我很好，还主动送我《参考消息》，当年那可是只有上层领导干部才能看到的内部刊物啊。为什么是这样？

一天连队演出后见到政委，他轻轻地拦住我，对我说：“我知道为什么你这么小个子，跳舞还总是钻到最后边去了。”

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注意到这点，抬头看着他，想不出他下边会说什么。

他笑嘻嘻地说：“你竟偷工减料。人家转三圈，到你那儿，就转一圈了事。哈哈！”

当年忠字舞，也就是比比划划。的确我跳时有点对付，竟被政委发觉了，可是他不批评我。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想文革进行到这步天地，不仅在校师生，即便部队的首长也都是“双面人”了，这是文革的特别景观。

三、板报投稿

在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时主要是种水稻，完成从插秧、间苗、除草、打稗子、收割、脱粒、扬场、入库的全过程。我们曾穿着棉衣，光着脚下水田插秧。没有农活时就挖水库，修渠、筑坝。

说是认命也好，说是觉悟不够也行，我始终是比较积极乐观的。干起活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反正磨磨蹭蹭也得用那么多时间，而且在农场吃的特别好，几乎顿顿饭有肉；另外上学时哪有这么多工夫锻炼身体呀。

当年经常开会，听首长做报告，总是从国际，到国内，到连队。有时还有人监视，必须专心致志地听。不知道是否有同学和首长发现，虽然看起来我非常专注，而且还边听边

记，其实每次报告会我都只用一支耳朵，而脑子在构思写诗。一来写诗很好玩儿，二来是为农场连队黑板报投稿。以下是我的部分稿件。

耕 田

我为秧苗铺暖床，纵横齐埂行对行。
祖国大地任我划，高山低头水改航。

筑 坝

西风横斜兮，地转寒。
弥河扬扬兮，南北穿。
我谓弥河兮，不要这狂。
拦腰筑坝兮，人定胜天。

修 坝

寒霜覆盖万倾田，
宏歌唱彻九霄天。
谁在那里舞蹁跹？
学生连，
挥锹大闹盐碱滩。
将士一百冲上前，
锹镐飞舞地沉陷。
感动天官众神仙，
齐下凡，
坝起库成转眼间。 ■

【述 往】

迟群草菅人命，任由血吸虫肆虐

王复兴

1969年7月至1971年8月，北大迟群党委曾分几批把2200多教职工迁移到江西南昌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此处是血吸虫病重疫区。在此，北大教职工曾大面积患上血吸虫病，有人为此丧失生命。对此重大事件，许多回忆文章都曾涉及，但鲜有详细记载与评述。

1969年7月10日，北大工军宣队领导派先遣队23人赴江西南昌鲤鱼洲筹建农场。8月13日、27日派出第二批、第三批共约600人赴江西鲤鱼洲进行建厂劳动。¹

1969年10月27日，北大全校20个单位1658人（全是教职工，没有学生），分批到江西南昌鲤鱼洲北大实验农场，下乡种地，改造思想。²

鲤鱼洲是血吸虫病重疫区。清华的五七农场也在此处。全国那么大，为什么非选这么个血吸虫重疫区办农场？许多老师说是为了对他们劳动改造。看来不仅仅是改造，还有惩罚之意。据了解内情的人反映：最初江西省推荐的干校地点在九江边上的一所劳改农场里，北大工军宣队负责人看过之后认为，尽管是劳改农场却守着九江，有鱼有虾，不利于知识分子改造。江西省又推荐了一个地方，在赣南的茶陵，也是个劳改农场，在半山腰，整天雾气腾腾，交通不便。负责人还是不满意，烟雾缭绕的，知识分子容易胡思乱想。最后，有人推荐了鲤鱼洲，这是鄱阳湖的一个围堰，是血吸虫病高发区，方圆七十里没有村子。季羨林在《牛棚杂忆》中也谈及此事：“北大绝大多数的教职员工，在‘支左’部队的率

¹ 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相关日期条目。

² 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相关日期条目。

领下，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改造。此地天气炎热，血吸虫遍地皆是。这个部队的一个头子说，这叫做‘热处理’，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迫害。”¹

早在五十年代，因血吸虫危害巨大，严重影响南方人民的生产、生活，“血防”成为重要国策。鄱阳湖区是远近皆知的血吸虫病重疫区，人烟稀少，人们路经此处都不敢逗留。

北大教职工去鲤鱼洲近两年之后，1971年6月10日北大江西校革委会才上呈校领导《关于血吸虫病防治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分校地处疫区，尽管……积极防治，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血吸虫病。”“从5月21日到6月6日17天内，对分校10个连队358人进行检查（按：是抽查），查出病人（患上血吸虫病）150人，占已查人数41.9%。加上5月20日查出的33人，共183人感染了血吸虫病。病人中，1969年8月至10月来场的（先遣队人员）占91%。”²6月12日，江西分校党委再给北大党委、革委会发函，说：“分校（所在地鲤鱼洲）四周，都是血吸虫较严重的疫区，到12日已查出病人二百余人。”³6月19日北大、清华两校合办的江西德安化肥厂在所写的《血吸虫普查情况报告》中记载：5月30日至6月15日全厂普查血吸虫病，其中北大129名教职工中有115人感染血吸虫病，占89%。⁴教职工们反映：在北大农场所在地，苇叶上的露水里都有血吸虫的蚴尾。

血吸虫病的蔓延使得北大分校不少人员出现了腹肿、肝大等症状。农场采取了诸多措施，但效果有限，情况持续恶化。当时，南昌各大医院住满了北大、清华的“五七”战士。于是，北大办起了农场医院，就地治疗。可是当上级派人前来视察时，领导还隐瞒实情，不让教职工、工农兵学员据实以报。⁵

从1969年7月北大先遣队去鲤鱼洲，过了两年时间，江西分校才向北京本部的北大党委告急，那时教职工患血吸虫病的疫情已很严重了。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江西分校的8341领导难道对当地血吸虫疫情及其危害一无所知吗？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向北京告急？

¹ 云之扬发布：《江西“五七”干校》，2009年12月24日，凯迪社区“史海钩沉”（廖太燕）。

² 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相关日期条目。

³ 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相关日期条目。

⁴ 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相关日期条目。

⁵ 云之扬发布：《江西“五七”干校》，2009年12月24日，凯迪社区“史海钩沉”（廖太燕）。

1971年6月，北大江西分校领导连续向北京总校领导紧急报告吸血虫病的严重疫情，但鲤鱼洲农场并没有立即撤点，直到1971年8月才撤销，搬到北京大兴农场。¹北大党委在6月得到江西的多次紧急报告后，又延迟了二个多月才搬离了地处江西血吸虫重疫区的农场，不知又使多少教职工感染血吸虫病。反正王连龙、迟群、谢静宜这些暴发的文革新权贵用不着去鲤鱼洲下水稻田干农活，用不着踩着泥水修筑堤坝。北大鲤鱼洲农场撤点时，校党委对撤销理由，在内部只轻描淡写地说，对“当地血吸虫情况原来调查研究不够。”²而校领导对外、对教师们所说的撤点理由，只是说当地教学条件太差。

血吸虫病是种可怕的寄生虫病，它们大量存在于江西鄱阳湖区，特别是鲤鱼洲一带的河流、湖泊及水田中，以人、畜身体为寄生体。其尾蚴10秒钟即可经皮肤钻入人体内。幼虫一旦经皮肤、口腔侵入人体，便会寄生于人的肠道膜的静脉血管，而后随血液进入人的脏器，特别是肝脏，在肝脏繁殖。一旦肝脏严重损伤，肝细胞不断坏死，便不可逆转。而后会肝硬化、肝肿大，肝坏死，脾、胃、肾、脑功能也大受影响，直至死亡。人一旦患上血吸虫病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潜伏、恶化的时间，有的人会拖得很长，有些人在七八年甚至十几年后才会因肝病不治而死亡。

北大、清华的8341领导王连龙、迟群、谢静宜即使不懂医学常识，也都熟读毛泽东诗词《七律二首·送瘟神》的诗句：“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北大、清华的几位“四人帮”的喽罗不是把“瘟神”送走，而是偏要把中国的知识精英往瘟神那里送！北大因血吸虫病到底死了多少教师？迟群主持的北大党委始终没有彻底调查、统计、公布、当然更谈不上问责、道歉、处理和赔偿。

人权的首要内容是人的生存权，是人保护自己生命的权力，是健康生活的权力。迟群之流无视人的生命权、健康生活权，任由血吸虫病残害北大、清华知识精英的健康与生命。这是草菅人命，是令人发指的践踏人权事件。

¹ 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相关日期条目。

² 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相关日期条目。

我的第一位北大授业老师也是我毕业后亦师亦友的魏杞文老师（北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讲师），1980年8月以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芝加哥州立大学历史系做研究与进修。行前检查身体发现肝大、脾大。因无其他不良症状，他照常赴美。在美校园他因肝病倒下住院，而后躺在担架上乘飞机回到北京。两个月后于1981年8月5日去世，死于肝病。当时朋友与家人怀疑死因与血吸虫病有关。1982年，我在北京见到魏老师的夫人丁始琪老师。丁说，那几年前后有许多北大、清华的中年教师（在鲤鱼洲时的壮劳力），得肝病去世，传说与血吸虫病有关。当时有朋友劝她对魏杞文的遗体做生理解剖、检验。但丁始琪当时想，人已经走了，做什么也找不回生命，于是作罢。丁始琪是北大国际政治系讲师、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博士的堂妹，魏老师去世后，她于1983年移民去了美国。

丁始琪在美国告诉我：1971年从江西南昌回北京的教职工们，很多人不知道江西农场曾对部分教职工进行过血吸虫病抽查，且患病率高达40%至80%（不同人群）。回北京后，北大没有对返京人员严格地进行血吸虫病专项普查。丁说自己就不知道应去做专项医疗检查。更不知道，如发现患病应去进行早期治疗，可以治好。她说，1980年前后教育部统计清华、北大教师的死亡年龄，平均年龄是47岁，极不正常。问题在于：迟群封锁了江西分校于1971年6月对血吸虫病的抽查结果，封锁了撤销江西分校的重要原因是因鲤鱼洲为血吸虫病的重疫区。江西农场的教职工回到北京后，迟群严重渎职、不作为，没有安排返京人员对血吸虫病严格地进行专项普查并提醒、安排患者治疗。丁始琪向我证实：她从江西回北京后就对这些防疫措施一无所知。这不是草菅人命吗？1980年前后（血吸虫的潜伏寄生期对某些个体可长达八九年、十几年），许多北大、清华的中年教师因肝病去世，始终对死因不明不白。

迟群、谢静宜草菅人命，任由血吸虫病大面积伤害北大、清华的教师，这是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是反人类罪行！此事件至今没有问责并彻底清算！世人皆知：六厂二校之中的二校北大、清华是毛泽东亲自抓的点。北大、清华的五七干校及教育革命，毛泽东会不过问、不知情吗？■

【资料】

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重要讲话（摘要）

1967年9月1日

江青：同志们，革命小将们，好久不见了，是不是？有的可能是见过，这个会很仓促，我讲得不一定对，对的接受，不对的批评，可以贴大字报，我也不怕你们轰（笑）。对全国形势，看过一些材料，有些看法上次在什么时候谈过形势，和你们不一样，可能部分不一样，有分歧，现在来看还是有一部分不一样，因此闯了乱子不小。昨天我和有些人会谈，形势就是大好。昨天和总理一块听了四川情况，就是形势大好。一年多了，难道形势越来越坏吗？不是你们，而是一部分坏人，而是有坏人，这就是“五一六”，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很值得警惕。“五一六”用极“左”制造分裂。有人提出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这观点我就驳过，武斗就是先进吗？我们搞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是落后吗？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我认为北京要带头搞好斗批改、大联合。搞本单位斗批改（谢：好得很），我们自己要搞好。北京有一二个学校不是试点吗？韩爱晶来了没有？（来了）身体不好？（没什么）北航、师大试点试了没有？要坚持，不要怕说右倾。要在本单位搞斗批改、大批判，在全国试点。要把本单位搞好，批深、批臭。各单位要搞斗批改，要批得比当年托茨基还臭。这任务艰巨呀！非常光荣的任务。我们不能代替你们，既不能代斗，也不能代改，这是文化革命落在你们身上的光荣任务。当然，工农不能因斗批改而耽误生产，由于一部分人背离大方向。青年人好动，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武斗就先进吗？北京打个稀巴烂好不好？（不好）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又搞起一个大串联，这是和去年完全不一样。去年是搞煽风点火，今年搞宗派斗争，去了一头钻进去，错了还不知道。你们还相信不相信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信）你们去了解决什么问题呢？这样做是错误的，不认错不行了。错误地判断形势，听了过“左”的情绪，有的是煽动，结果你们斗争锋芒完全

错了，不是打击走资派，而是对准军队、革委会，这完全错了。你们要相信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手缔造、领导的，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军队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相信军队，就是有少数坏人，广大指战员是好的。这是有阴谋的，把军队搞乱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来了怎么办？到处去揪，还说你们不去揪，我去揪。陈再道的确是少有的，赵永夫更少，全军几百万很少有坏的。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这口号是错误的，打乱了我们的军队，这是自焚长城。我讲得对不对？（对！）你们不明白，即使我们军队老干部说了一些错话，一旦打起仗来是勇敢的，是跟毛主席的。到处再搞一小撮，搞喷气式，我们是反对的。你们这么搞，什么人高兴？我这不是说军内有少数错误不能说，我是批评这个口号，到处揪某大麻子，某老谭，到处套，这是别有用心，想打乱阵营。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保卫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提出这个口号到处搞，乱哄哄的，我很气愤。我要是战士，要是夺我的枪，我就开枪。这样说可能过火。现在炮也夺了，一天打了一万多发，就是左派也不对。（总理：要是到越南，能打多少敌人？真是败家子）是左派也该批。另一个锋芒是对准革委会。做了错事就要打倒吗？这对吗？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我是说斗争锋芒错了，但不一定是坏人，改了就好。总之，先进的北京就是搞斗批改、大联合、三结合。制止武斗，把挑起武斗的一小撮坏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我上次讲过的，不知讲清楚了没有？没有准备，大家考虑对不对。我现在重申几个问题：北京有苗头，昨天有四五百人冲了中南海。去年在几个红卫兵成立时，我说过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驻地——中南海、钓鱼台，外国使馆、大会堂，不准冲。反使馆可以在外边搞！甚至可以钻到里面，那人家完全可以进我们的大使馆，抓我们的人。这是多年惯例了。最近搞了英国代办处，结果我们十几个人在那边就挨了打，黄埔港援越物资也被抢了。要警惕，国防部不能冲，京西宾馆不能冲，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电台、革委会不能冲。我看了材料，光明日报最近被查，怎么能随便抄。（谢：要查谁抄的？）（总理：卫戍区马上回去查。）有六六通令还抄？打砸抢这股歪风一定要刹。西单商场打得那样厉害，不管哪一派头头，一定要抓起来，这已是刑事犯罪了。以上可能有遗漏。大家说对

不对？还有西山重要地方，大家不要去。还有宾馆，会损坏国家荣誉的，是坏人利用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光是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不行。我告诉你们，我永远忘不了三年在延安的整风，做自我批评，肯定自己，又否定自己，再肯定自己。哪像你们，自己连检讨也不做，不许人家批评，不是冷静考虑问题，情绪一上，就干起来了。

说一下聂元梓同志，我上次批评了她，我指出她的缺点和错误，没有说要打倒她。对她对的要支持，错的要批评，和对别的同志一样。聂元梓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两大功劳：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其中之一，另外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徒集团。但是聂元梓背了两个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不对？（对！）但你们也不给个机会。那个叫什么“红旗飘”的，上次的发言不好，也不见得高明，并不是因为他说了我的坏话才这样的，“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群众是好的。（谢：还有一些大字报很庸俗。）牛辉林到处去抢、抄，是有人授命给他的，别人授命，要我就不授命。（康生：杨勋、杨炳章在什么地方？聂元梓：前些时候卫戍区要放，我们不同意。）杨勋、杨炳章是特务（康生点点头说：是特务）。我希望聂元梓同志要放下包袱，不要自己记功，我们是要记的，一个共产党员做点好事是本分，完全应该。做错了，要改正，要不断地为人民立新功。聂元梓同志就是吃老本，还做了许多错事，被揪住，甚至连她的组织也要垮台了。她的组织是很好的！她的助手不好，出了许多坏点子。聂元梓同志要丢掉包袱，丢掉错误，重新上阵。蒯大富可能也是这个问题，要丢掉包袱，重新上阵。我们不愿人家打倒你们。还有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也是这样。还有几个人，我们记不清了。要天天记住为人民立新功。我讲得不对，可以炮轰，打倒都行。但是我是满怀热情对同志们讲话。

伯达：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很重要，大家要注意，要认真讨论一下。是代表组织、代表中央讲的，这是政治的讲话，是重要的，战斗的讲话。文化大革命现在又处在重要的转折关头（江青插话：“5.16”表面上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是拆台的。从“左”、右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5.16”是反革命组织）。党中央发出了重要的号召，你们要坚决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很好地讨论江青同志的讲话。……还有

一天我去北大，从大方向是帮助聂元梓的。当时我提了三条协议，其中有取消航空版，不要搞那么多人搞动态组，不要搞一千人搞。还有保卫组。我的意见是商量一下。我走了两个钟头就抄了，不要这样匆匆忙忙么，不要派性高于一切，要无产阶级党性高于一切，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抄家算什么革命行动？有少数同学，还有工人，头脑乱哄哄，派性高于一切，而不是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是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而是自己小团体利益高于一切。还有抄家，去抄自己的东西。封建阶级抄家还要经过皇帝，现在是自己随便抄。我说你们不要上当。你们年轻，在这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有从极“左”方面和极右方面，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们要注意保护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像保护自己眼睛一样。……

谢副总理：开了好几个钟头，通过了一个决议。刚才几个负责同志讲了，我没有多少话讲。1. 大批判，工农学都要狠抓，抓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刘邓陶、彭罗陆杨，从政治、思想、理论上批深批透，更重要的还要本单位斗批改搞好，对此不感兴趣，实际上，搞好本单位就是对全国最大的支持。清华、北大、师大，搞好本单位是对外地支持，否则不搞好本单位去外地，说个不好听的，出风头。江青同志点了北航、师大，每个学校都应这样做，所有红卫兵小将都应该立新功。发动时期有贡献，但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要在斗批改中立新功。

2. 巩固发展革命大联合，这是大方向。所有北京市革命派，高举革命大联合旗帜，反对打内战，不要分派，分派我反对。哪个同志做得对，我们支持，做得不对，我们反对。有什么理由不联合？人家联合，非把人家搞垮！上海市很气愤。伟大领袖提出大联合，革命师生要团结好。不听江青、主席的，要听谁的？北京两派都是革命的，有个倾向，抓住某派几个人的缺点、错误，想搞臭，搞垮那一派。这是错误的，就是哪个人垮了，那一派也垮不了。江青同志说的我同意。北大聂元梓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但要把人家打倒，我反对。有些大字报很不严肃，我反对。地质的朱成昭是坏人，该打倒，但地质划清界限还是革命的。

还有个条子：“打倒谭厚兰”，是错误的，不要随便打倒，要打倒也要和中央打个招呼，革命群众领袖树起来，怎能随便打倒。还有打倒徐凯，不能自己拆自己的台，这不好。不要在哪一个人、哪一个组织出了点问题，就想捞稻草。

为什么我对两大派斗争不感兴趣了？斗争是否一派要消灭另一派？不消灭，前途是什么？（联合）消灭哪一派我看不行。要我支持一派，我不干。批评我在派的斗争中旗帜不鲜明，我不能接受。我要支持一派压一派，就是反动路线。不管哪一派，对的我就支持，错的我反对。全国都看北京，是否要联合起来；在北京制造两大派，没有两派的就硬是去支持搞出一派。要到全国去制造两派，严格说，这是犯罪。

我们应强调联合，不能制造分裂，在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中立新功。去年八九月出现了少数派、多数派，我们支持少数派与反动路线决裂，是对的。现在不同于去年了，如果只讲小团体主义，不讲联合，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是错的。为什么坏人可以兴风作浪？为什么武斗？坏人利用小团体主义、派别，还利用四大民主，不要上坏人的当，我们要有敌情观念。一小撮走资派，帝、修、反、坏，没有死亡。……

今天是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伯达、江青、康生同志讲了很好的话，过去谈了类似的话，但并没有记住，小道新闻听了很多，不是按毛主席教导去做，少数人按小道消息去做。如不按刚才讲的去做，就会犯错误，不按主席教导去做，就会走上邪路。上次讲话都说传达了，但有相当单位没有执行。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你们研究一下，召开个大会，每个学校至少十人或廿人参加，原原本本传达，与上次讲话对照，看做得怎样。中学由中学红代会传达，四三、四四，不三不四都要传达。工代会、农代会、机关也要传达，不能歪曲，传达错了你们负责。

这是内部会议，不准贴大字报。■

资料来源：油印本《毛主席的新北大》

新北大公社火车头编辑部 1967.11

【资料】

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部分组织负责人讲话

1967年9月16日（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江青：我们现在开会，小将们，你们不是老将，先读语录，带来了没有。好，现在请总理给我们讲话。

总理：这次商量找首都红代会各学校组织来会议商量一些事情。但是现在北京分为两大派，天派，地派。今天主要接见天派。我最近才知道，听说我是天派的后台。我倒是喜欢坐飞机，但是飞机要从地上起飞，以后又要回到地上。天派有一个观点，小报中有一个错误估计。任务从形势而来。今年春天清华井冈山小报对形势估计很坏，说什么要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去了。你们不知道党中央情况，到处道听途说，瞎估计。

最近又是，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后，在八月五日天安门城楼上，有人认为是第二次大串联。我讲，哪有这回事。我们根本不是这样估计。形势推动我们前进，我们否定这种错误估计。尽管我们这样说，但是同学们不回去，还是这样讲，这样估计，还是这样做。八月十日、十一日两次座谈会，我们批评了这种估计，你们还是这样估计。清华派出四五千人，北大也派不少，北航也去了不少。我们不断地号召回来，但是不灵（江青插话：清华去了五千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清华井冈山今天登小报反对我。蒯大富你站出来，你们今天就反对我。我是批评你，不是打倒你，坐下）。连武汉三钢三新都说是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这样估计是错误的，还提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武装夺谁的权，就是要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问题”就是企图夺军队的权了。揪军内一小撮，七月我们纠正了一次，但是八月到目前这个错误口号就是没有肃清。我们与大学红代会谈了多次，但不灵。北京的话传到全国，现在有些地方还在揪军内一小撮。

党中央的估计与你们相反。七八月份，各地军队承认了错误。解决了河南、湖北、湖

南、浙江，江西都有了解决，比上半年快得多，我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亲自领导的军队。人民解放军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一号召说错了，解放军马上就认错了。解决武汉问题就是靠毛主席，靠军队。不是靠别的奇迹。这就是相信人民，相信党，相信解放军。陈再道、钟汉华这些人有什么多大的作用，一下子就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又过三个半月了，文化大革命向深度、广度发展了。全国已经有七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把文化革命推向前进了。现在正面临第二个年头，要思想革命化，要夺走资派的权，要巩固胜利，我们有无限胜利信心。首都红代会不听我们这些，主观臆造，错误估计形势，影响全国，与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方向背道而驰。例如，江青同志九月五日有一个讲话，你们放了录音了吧？（众：都放了）她讲了三个问题，可是你们的做法与这三个问题都相反。

江青同志讲要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出要巩固这个领导核心。所以，九月一日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我们讲了“5.16兵团”是一个阴谋反动组织，它要动摇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姚文元又提出了它的性质。但这主要是一小撮坏头头，从极“左”方面破坏党的领导，我们要认真对待。他们的矛头不是反对我个人周总理，实际是反对中央文革，我与中央文革是一起战斗的么！一起办公的……，这你钻什么空子呢？有人想从极“左”钻空子，我们小将到处传闻、油印、推动、捏造，总归是干扰我们的工作。今天我们就是帮助你们。

对“5.16”不应扩大化，总是坏头头，对揪黑手要认真对待，不能在群众中揪一派打一派。“5.16”就是靠造谣、阴谋活动的，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在群众中扩大化，不要拉一派打一派。对“湘江风雷”就是这样，他们的头头有坏人。我们过去听军区的多了，现在解决了。“5.16”别看名字上有几方面军，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群众会觉悟，他们本来就是造谣生事。这是第一，不要扩大化。

第二，你们学校各组织真有这样的人，你们应该划清界限，由本组织自己揪出坏头头，这样我们欢迎。农大东方红查出了秦化龙是叛徒，他们听我的话，批谭时没让他上主席台，

他们农大东方红将秦化龙扭送卫戍区，我通知接受。我今晨接见了他们。虽然他们东方红查出了“5.16”分子，但是他们找出来了人证物证，自己揪出秦化龙扭送卫戍区，这很好。安徽两派都是革命造反派，中央解决问题以后，两派都打电话揪黑手，他们从没有讲过团结，P派和好派也一道揪黑手了，这是从没有的好事（康生插话：两方争先恐后地交武器，自己把自己的坏头头抓起来，送交军管会）。

秦化龙是个叛徒，不是一家调查出来的，农大的问题两派都参加了，你们应该欢迎他们。揪叛徒问题，天派、地派都合作了，这个行动完全有利于党的纯洁，为什么要分裂呢？对“5.16”要有这个精神。

第三，“5.16”的头头揪出来了，不要因为有几个坏头头就认为群众都不好了，把群众推到对立面了，这是群众斗群众。

第四，“5.16”兵团以极“左”面貌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从内部挑拨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我和中央文革不可能都是一个口吻，如果谈什么事都是一个口吻，那就一个讲好了（康老插话：勾心斗角的看待中央文革和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资产阶级思想。“5.16”从极“左”方面来干扰。但也要防止二月逆流那样从右的方面来干扰，两者形式不同，实质相同。所以我们要指出“5.16”问题，但不允许老保翻天，不能借此机会翻案。文汇报今天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从中央领导巩固起。

你们何必来干扰党中央领导的内部生活呢？我们是一致的，你们胡说乱猜是胡闹，是干扰我们的领导，是不能得逞的。如果你们是受坏人操纵就揭发，若是自己认识问题就改正。地、富、反、坏、右，坏人都想拆党中央的台。你们青年人思想常常摇摆，别的地方一听到你们的电话，就以为你们从党中央、中央文革得到什么法宝了，这很不好。当年五四运动青年受封建和军阀思想影响有派别是可以的，当时北大就有胡适派、陈独秀派。自从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取得了我们党的领导地位之后，总是一派红线。虽然有刘邓黑线在作怪，但仍然取得了伟大胜利。可是你们却扳着手指头算党中央还有几个人了，这完全不是毛泽东思想，是五十年前我们对北洋军阀的看法，现在虽然有走资派、特务，但是主

要还是毛主席的伟大领导。回想五四运动时，你们比我们高明多了，但是你们不能飘飘然，要好好地从天上回到地上来。

江青同志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要巩固人民解放军。主席讲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其中武装力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卫着我们，从去年保卫红卫兵小将就提“四不”。而你们如何看呢？就相信揪军内一小撮，到处分析，说：“林副统帅只能指挥五分之一军队了”，简直一派胡言，这根本不符合我们四十年的历史。林彪同志提倡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四好连队，我们怎么能怀疑呢？不错，军内也有坏人，像陈再道、钟汉华、赵永夫等，但是绝大多数是经得住考验的，怎么能用“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呢？如果有坏人挑拨你们就要上当的。拥军爱民是毛主席早就号召了的。我们现在面临国内外阶级敌人、走资派，要更好地树立敌情观念，这一点在一到打内仗时就忘记了。有些领导靠边站了，应当考虑大联合。北京武斗有的比较严重，西单商场、北京光学仪器厂把国家财产破坏得那样，参观的农民是带着眼泪出去的，工人弟兄们如果看清楚了一点，也是不允许的，你们不感到痛心吗？我再说一遍，你们去抓军内一小撮的思想是错误的，你们跟军队继续对立的作法也是错误的，比如军训应该很好地支持嘛！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军训，在大中学校进行适当的军政训练，这样才能很好地提高三性嘛！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才能扭转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特别是知识分子需要这样。还有军管，有的国家机密的地方，必须实行军管，许多机要的地方，让群众随便出出进进行吗？像人民大会堂，中央常在这儿开会，也不能随便出出进进。（江青：那天我在市革委会还重申要保卫那些单位，可是昨天就有人像强盗一样冲到《红旗》去了。对总理说：你听说过没有？（总理答：还没有）请谢富治同志注意，要侦查破获逮捕，该什么法就判什么法，要实行专政）。

我们在北京就发现有违反严格的纪律，不如原先我们对批判犯严重错误的人，一直到走资派，我们都是用批判的方法，我们不赞成体罚、弯腰（戚本禹：这是王光美搞的，在桃园搞四清时创造的），这是王光美在桃园搞的，叫什么“燕飞”，就是这样（姚文元：爬

墙捉人是刘诗昆、叶向真他们捉彭真时先搞的，打解放军也是他们搞的，就是从去年10月28。康生：以后王任重十万人大体育场大会上搞这一套，搞了几个小孩子)。现在发展到对小将犯了错误就把他踩在脚下，这个都不好。不能这样对军队，夺枪就更不好嘛！北京还好点，外地还在继续，解放军是搞保卫的，可是你们连解放军的武器都抢走了，有的年轻人以为好玩，一个人背三支枪结果走火把自己打死了，这不是光明磊落的，这是特务的行为。从去年八月来我一直说爬墙把人架走，这是不允许的，靠偷听别人的讲话，搞窃听器，公开的在我们说话时，身上带录音机，这一套是罗瑞卿他们搞的嘛！偷听电话，偷记录，偷日记本子，这些办法是资产阶级的特务方式，修正主义的特务方式，或是法西斯方式。我记得去年北航红旗得到了一份叫斗争策略的小册子，上面还写是绝密文件，韩爱晶同志你知道吗？（韩：不知道）我看到了。这完全是特务的方法，这一套是蒋介石军统特务的方法，小将们学了，我听了非常难过。你们跟着毛主席总应该学得好一些，我想想这些，我不说对你们我是犯罪，所以你们必须把这些去掉。还有抓人，你们把供认的话曲解，这也是站不住脚的，这些手法是罗瑞卿的。我们不是要反对彭罗陆杨吗？不是反对刘邓陶这些走资派吗？所以我们不能那样做（江青：我们宣布一切秘密会议为非法，我们没有秘密会议，我们的一切你们都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向中央保密呢？我插一句话呀，总理，北航红旗有人写信给蒋经国（总理：就是那个蒋介石的儿子）我给你们念一点：中央社台北十三日电，“中央青年救国团，自从总统发出……救国运动以来，以各种方式向大陆青年发出号召，引起普遍热烈的反响，大陆青年纷纷来信，切望早日反攻，最近本团接北平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一位红卫兵写给蒋经国的一封信，对于大陆青年当年的残劣的武斗的艰苦处境表示迷茫，并且发出呼吁，他们究竟出路在哪里？”你们听了这个，感到可笑不可笑呀？你们吃惊不吃惊呀？这里有坏人的，这是少数人背后在活动的)。只要有一定的气候土壤，地富反坏右就要活动，北航应引起警惕了，别的组织也要引起警惕了（江青：这是正常的，不纯是正常的现象，但要相对的纯，这个案应该由你们自己去破了)。我们要夺一小撮走资派的权，然后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建立革委会。革委会正像一个婴儿一样，

总会有缺点错误，我们是爱护它呢，还是整死它？当然是前者，前者是革命，后者是反动的。但是现在北京就要把一个学校就是北师大的革命委员会，就是给他颠覆掉了。不仅内部，外部也有人。你们不少人也在嘛！我知道韩爱晶、蒯大富也去了（江青：聂元梓也去了，躲在一个地方指挥）（聂站起来讲：那天我们在学校开会，我没有去）。有待证实，还有待证实（江青：聂元梓来了吗？啊，坐到后边去了）。我们反对外边人去干涉，但你们就去干涉人家，我们感觉非常不好过的。我们看到这种现象三个多月了，还是有这种现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学主席思想，学得不好，我们就犯错误，当然你们也免不了犯错误。我跟你们说我犯过错误，也犯过路线错误，我并不隐瞒这一点，也不要“5.16”整我的材料，不需要你们去收集我的材料，我受过四十年党的教育，我记得很清楚（康生：我看到小报上已经出现了这么一种说法，说是我们把矛头对准革命小将，把我们无限爱护小将，无限关心苦口婆心的讲话说成是矛头对准革命小将，这是别有用心的）。我们力求少犯错误，我曾不断地要求，我已经七十了，我还要做到老，做到死，做嘛，实践哪，不然不能进步嘛！还要学到老，还要改到老，不进则退呀，还要跟到老，跟毛主席林副主席，一直跟到最后。可是你们不是这样，只有一点成绩就固步自封了，就自满了，就盲目乱干。当然我们犯错误比你们影响大了，我们要时时警惕自己。你们影响也不少呀！我们北京的工人运动落后于上海，由于工人运动起来的晚，我们注意的差，知识分子左右工人运动了。（江青：你们是从小受资产阶级加上修正主义教育的知识分子，不要忘了这一点，还没有斗批改嘛！我讲的对不对呀？）（大家回答：对！）比如蒯大富同志，我在这里边首先认识了他的，他的思想就非常不稳定喽，尽管出身在劳动人民家庭（江青：是劳动人民家庭，是革命干部子弟）。调查是这样，思想还不断变嘛，但是要锻炼，要相信群众，要相信党嘛，才能锻炼出来。韩爱晶同志我没有直接接触过，那天开会，我的医生跟我去，我听说他很瘦，就叫医生去看他，我没想到这反倒成了他的负担了（江青：韩爱晶呵，我宠坏了你了，我难过，你写的自我批评不是什么自我批评）。要联合起来，革命委员会不能随便搞垮它，反而应该支持。工厂机关也要逐步成立革命委员会，所以江青同志五号讲话特别强调这三个任

务。刚才江青同志说了，你们受了资产阶级思想教育，受了修正主义影响，你们学校真正能够好好受毛泽东思想教育是比较晚的，运动这样蓬蓬勃勃你们老是坐不下去，有时和你们见面，听说你们连人民日报社论都来不及读，思想上资产阶级就泛滥起来，所以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特别是包打天下，这在北京的同学的确很厉害。运动初期红卫兵起了急先锋的作用，那时北京一下子掀起来了，那时到全国点火是对的，有成绩的，到了今天，八九月份每个地方都起来了，每个地方自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了，不需要你们来干涉了，而北京的同学还要包打天下，到现在还不肯把串联的同学找回来，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并且要把北京的两派思潮带去，影响全国，只要是少数就支持，造成外地对北京的学生的反感，我们可以老实地说，不少的电话是不同意你们的。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帮倒忙”。这三个字非常恰当（康生：帮倒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但是你们不听。谢富治：有人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五条决定是大毒草，不讲阶级分析）。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以我为核心”，今天文汇报的社论说，什么都以我为主，现在两派发展到这个情况，不管你功劳多大，人数多，你总得把少数争取过来（江青：北京的天派要吃掉地派，地派要吃掉天派，吃不掉的，你们天派老老实实从天上下来，否则跌得粉碎，地派也要从地下钻出来，否则闷死）。就是唯我独尊，唯我独左。工厂的工人容易觉悟，他们没有根本的利益的冲突，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学校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这一派那一派是会有些变化的，但是我们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联合起来，你们的情况就是私字当头，派性高于一切，派性高于党性（江青：所谓内战，就是私战，文汇报上有这么一段）。不要这样，我希望你们还是按照十六条办事，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紧紧跟随我们伟大领袖的航向，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不然你们本单位的斗批改什么时候完成啊？特别是学校。我们给你们提了个意见，给一个月期限，如果不回来就开除学籍，你们同意不同意？（江青：毕业生不回来不分配工作。谁不参加斗批改或参加得不好，这就是斗批改的分数，应不应该？答：应该）你们还能放一辈子假啊？有个期限吗，现在到时候了，掌握这两个武器就好了，比

出个通知有效得多。我们要求两件事，第一，为了过好第二个文化大革命的国庆，我们学校的两派联合起来，可不可以呀？（答：可以！）我们准备派军队帮你们练队到你们学校里去，如果你们接受军训就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如果不接受军训，就不能参加。第二，三秋到了，在我们北方可能晚一点了（江青：有的地方地富反坏右抢秋，要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我们要保护秋收，北京在国庆节之后你们真正到农村去锻炼（伯达：不要两大派观点，丰产要丰收呀！）对，要丰产丰收，还有分配和收购都要搞好，这两个事都是考验喽。我话说得长了点，我不能举很多例子，我只熟悉清华北航，还有外交学院，还有农林（有人反映：有的同学从外地回来，把枪带回北京）。啊，还有外地去的把枪带回来了，哪来的胜利品呢？不管哪一个，步枪、手枪、子弹、手榴弹，这是国家财产，都要收回来，不能叫胜利品，是武斗搞来的，要交出来，好了。

江青：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伯达：你们是天派呀！说我是天派的后台，我是今天得到的消息。有人说戚本禹是地派的后台（康生：北大有个系统表说我是林杰关锋的后台。周总理就是另外一派，陈毅、谭震林的后台，有书为证嘛！不是造谣嘛！江青：有人说我是聂元梓的后台，其实我是不三不四派。笑笑对伯达说：你算什么派？）我只好是天派了（江青：你们要知道我们也是争吵得很厉害呀！（笑））在中学四三派说我是四三派，四四派说我是四四派，我说我是不三不四派，李钟奇同志可以作证（李钟奇站起来说：是）说我是天派的后台有点影子，我给韩爱晶多说过几句话，我和韩爱晶、蒯大富的讲话都可以公开，我的全部讲话都可以完全公开，可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江青：现在造谣的事多了，各取所需的事多了，得想个办法，绝不能是造谣有功嘛）。还有人说我谈袁世凯，韩爱晶，关于那个袁世凯的事是我对你说的，还是我不叫你说的？（韩爱晶：是我说的，是您不叫我说的）。说我谈袁世凯，这不是笑话吗？我怎么能说这个话？我这个人不太容易记住人，是个没有记性的人。我今天对天派，你们也不否认你们是天派吧！我首先要提出两个问题，对韩爱晶对蒯大富，对于天派，你们有没有鲜明的态度？有没有鲜明的旗帜？对二月逆流（韩：有，坚决反对

二月逆流),以后再讲吧。第二个问题,对“5.16”反革命集团表示过什么义愤?在这里我要批评韩爱晶蒯大富,我是保他们,你们说我是天派,我不是天派,我是不三不四派嘛!我要批评韩爱晶蒯大富,我批评的不对请你们批评我。就是有一天晚上我把你们接送回来。你们不要坐在后面,坐到前面来,前面有位子,坐在地下(蒯、韩走到前头坐下)。(江青:不要搞得灰溜溜的,爱护你们才批评你们嘛!要挺起腰板听批评,不要老低着头)。我就和韩爱晶蒯大富坐到一个车上到西门去,我们就讲了(江青:我是你的副组长,都向我保密呀!(笑))。这个到西门去呀,和你们两个人讲。那天下雨了,我说,送你们到清华去吧,我就说了话(江青:啊,天派的后台今天自己坦白了(笑))。你们对我说的一些话都是一些悲观情绪的话,我讲了什么?(韩: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光明,无限的前途)对,我讲的是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光明,无限的前途(韩:还有行百里半九十)。对了,我批评你们悲观情绪,我变成了你们的后台老板了,可是你们说得天要塌下来了,什么这个也修了,那个也修了。你们有这样一个思想,有这样一个悲观思想就不能正确地对待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不能正确地估计形势,中央毛主席说大好形势,你们和我讲的尽是悲观的情绪(有人小声说:听不懂)。听不懂,我现在不要翻译了,我是中国人,听不懂活该,不要翻译了(大家笑了)。你们的估计以为自己正确,实际是悲观情绪,其实是自己欺骗自己。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都是这样说的,我们是大好形势。而你们是很悲观的,你们不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吗?你们对江青同志的拥军爱民的战略性的讲话,你们好好学习过吗?想过吗?还是背道而行呢?!你们到全国各地去抓军内一小撮,这不是糊涂思想吗?这不是中了敌人的妖计吗?江青同志说了一个台湾的消息,北航红旗有人给蒋介石的儿子通信,这不能引起你们的警惕吗?文化革命是彻底的思想大革命,林彪同志讲的,要革头脑的命,听得懂吗?在你们的面前,我们的敌人用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你们,你们不觉得,你们当了大官了,韩爱晶,我听说你们许多人到西安去是坐飞机去的,我说你们都有钱买飞机票吗?他说我们掌握了财政大权了(韩:我们是坐火车的)。你们拿钱挥金如土,你们口口声声拥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是你们实际上的

语言和实际上的行动不听中央的招呼，是不是这样呵？还有那天北师大问题（韩：第二天我们开会，那天江青同志批评了我们，我和蒯大富去了，我感到错了。江青：不要搞秘密会议。戚本禹：你们那个会，北航、清华、人大三红、体院的，那样的会不能开。江青：非法的。戚本禹：非法的。江青：你们背信弃义嘛！有什么不可以告诉我们的？人大三红的刘庆库当面就说，我们是和平颠覆队，刘庆库来了没有？（刘站起）我看你就是个和平颠覆队，你们三红里面有很多特务，你们保着孙泱那么一个大特务，我怀疑你自己不是学生。刘：我是学生，五年级的，26岁。江青：言而无信呀！你们对我们，现在我们就向你们宣布：不许搞秘密会，那样和五一六有什么分别了？五一六就是搞秘密活动）。拥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的同学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最近福建来电，讲北京来电话：我们到福建，先来五百人，以后再来到三千人来揪军内一小撮，就是这么搞的，当时给谢富治看了（江青：怎么没给我看呢？）。给谢富治，那天我就给谢富治了。那个电报是撒谎，说假话，说我们派人到军内抓一小撮，抓福建的陈再道，包括天派在内了，北京的学生到处乱跑。难道这是正确的态度吗？现在你们心都慌慌的，我担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你们施加影响，虽然你们是造反派，我有个建议，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出门都坐公共汽车，不要坐小汽车好不好？（好！）还有财政开支要公开，错了就是错了，还用资产阶级的手段，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于你们各派之间的关系，你们就是要吃掉对方，大鱼吃小鱼，所以北师大那个行动是不好的。为什么不能共同谈一些问题呢？还有聂元梓也去了（聂：我没去。总理对戚本禹：还没查清楚）。总之，你们是幸灾乐祸了，你们搞他们，结果你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还有那天我和韩爱晶谈了，你不能歪曲我的意思啊！（韩：这是别人说的，乱猜的，我没说过）。这怎么能说乱猜呢？说我讲袁世凯嘛！（江青：你们都是听谁挑拨一下就上当，坐下）。我想把心挖给你们，把我肚里的东西交给你们（江青：（笑）那你就完了）。可是你们对我的回答不是这样，我跟韩爱晶谈过的呀！你们搞你们的复课闹革命，不要搞旁的事，搞你们自己的都搞不赢，都搞不好，还要去攻别人（江青：我看你真是后台了，交给高招了（笑）。（伯达笑着说）今天晚上摊牌嘛，是后台不是后台没关系。你们

自己可能不知觉，抱了一块大石头，几块大石头，说我得到宝贝了，就使得别人牵着自己的鼻子走。北航没有后台？（韩：我敢保证没有）很难说哟。蒯大富有没有后台？（蒯：我保证没有）聂元梓有没有后台？（聂：没有。韩：我校的大方向我敢保证，我敢向党保证，我绝对忠诚。戚本禹：老实告诉你，不要说的那么绝对。江青：（对韩）你这样说不是一个毛泽东思想者，太绝对了）。你们可以调查研究嘛！你们有后台你们自己不知道（韩：后台如果说是指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这算不算后台？）不一定，有时你们不知不觉地被别人拉着走，你们的头脑要清醒一点。

江青：北大传了，说现在立第三功了，聂元梓真是不知害臊，记功让人民记嘛！老实告诉你，去年我和陶铸作斗争时，你还认识不到呢，你和王任重，你跟着他走，王任重是个 CC 特务，国民党特务。人大的孙泱可能是个日本特务，也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你们三红还保他？（三红：我们没保，去年六月份就把他揪出来了）

戚本禹：是这个事，孙泱的秘书是不是和三红一起的？是不是把你们的大字报都拍了照片给孙泱看。

江青：他的秘书叫严惠明，是只黑手，是中央文革揭了孙泱的盖子。

康生：是我们告诉你们他是大特务，是日本特务（三红：在人大最早造孙泱的反的是三红）。

戚本禹：现在两派都有。

伯达：你们可能上当了，你们要注意，抱着一块大石头（江青：当心砸了脚），要扔掉石头，才能看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北师大这个问题是不简单的，革命大联合不搞，搞垮一个革命委员会你们就联合了？（江青：性质很严重的，大鱼吃小鱼）搞本单位的斗批改，提高警惕啊！不能包办代替呵！到各地不能包办代替，到北京到处插手，这个手要伸回来。你们有后台，你们好好研究一下再说嘛！不要匆匆忙忙表态嘛！要好好调查研究一下嘛，不要冤枉好人的，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我批评你们，你们这样搞不对就是不对嘛！什么线把你们拉到一起了，你们所作所为，特别是你们自己意想不到的。会造成老保

翻天，北师大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江青：现在北大是老保翻天，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了。今天跟同学们，小将们开这个会，我心情比较沉痛，由沉痛变成气愤，所以几次都没有冷静的和同志们谈。我觉得我听你们意见的时候比较少，我要做自我批评，因此不能从思想上到政治上及时地帮助同志们提高，确实这样，批评你们太少了，都是说好哇好哇，当然老保翻天，抹杀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我们是不答应的。但是我们在许多关头、场合，我们是关心溺爱的。你们应了解。我对自己孩子也是这样，我生了一个孩子，我对她说过，你不跟爸爸妈妈，你就走开，她今天来了。我们过去常说韩爱晶怎么怎么好。他还造了我的反（笑）。我批评韩爱晶，你接受我的批评，你不理解，你如果理解，你懂得我对你的是溺爱的，见了你就是笑眯眯的。圣人哪，你是小圣人哪。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个绝对主义者，主观极了，我不敢保证，我不敢保证，说得太早了。北航的情况你敢保证吗？六月三日我就注意到有人想从极“左”的方面或右的方面动摇毛主席领导的，刚才总理、伯达同志讲了，我们对你们太宠了，要求不严格，接班人是接什么哪？主要是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接别的。而在你们脑子里边，我看毛泽东思想很少，毛主席从来不绝对，不武断。主席不久前告诉我们，要我们告诉革命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他的原话是这样讲：

“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同志们想想吧！你们的错误，我们不能全替你们背起来，当然我们也有责任，我们对你们帮助得不够，而且你们自以为是。我们批评你们，可是你们后来根本不听。一次蒯大富提出来了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我很惊讶！你的思想水平不是提高了，而是落后了，这一点我想提出你们深思，以后联系有几次总是背道而驰，对我们言而无信，这是什么问题呢？我看除了少数坏人浑水摸鱼以外，就是你们自大狂，个人主义膨胀，膨胀的没地方放了，把自己置于党中央之上，置于人民之上，你们是救世主，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作鬼。而去年蓬蓬勃勃的革命朝气，现在变成了另外一种方面。我没说全部，我是说部分，背离了大方向的部分，甚至是起作用的部分，我们想告诉你们，

不要以为我们没有你们就完了，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就完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有一千八百万党员，就是有一万人坏了也还是少数，除掉了几十年的隐患，这是很大的胜利。你们看不到。韩爱晶写了自我批评，什么自我批评啊，是大老爷，连个名字也没有写，不写江青同志（韩：那天晚上……）。你不要辩解，你对不起我，在座的我没有一个人这样宠爱你，宠坏了，要说训子，我就要训你。我气就在这，训无产阶级的子女，你脑子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我要训的是你，蒯大富我都不愿训了，坐下吧！总的说，天派也好，地派也好，我们还是做的工作少，我们有一些缺点错误，我们应当承担，我们也不那么轻松。虽然我们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们总是共患难的，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我是非常关怀你们的。现在你们甚至连主席的话也不听了。有的反动的小报上讲：江青算老几。我也不算什么，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不要以为我们离不开你们，你们回去要开门整风，要把自己组织里边的不纯的人清除出去，否则是很危险的。还提醒你们，如果你们不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我们不靠你们，我们靠军队，靠劳动人民，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军队会马上跟我们走的，这我跟主席几十年了，我清楚。如果你们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调查研究，而是学邪门歪道，你们总是摇来晃去，这一点是主席一贯反对的。什么窃听呀！什么动态呀！什么作战呀！什么拆信呀！小李的信被人家扣留，我的信件也曾有人用特务的手法搞了，给我专政哪，你们不要学那一套。这些不仅是罗瑞卿，还是刘少奇的。主席关心你们，告诫你们，现在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我说的是真正的小将，阶级异己分子不在内。我想突出地讲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缺乏敌情观念。刚才韩爱晶的这种表示也是缺乏敌情观念，中国有三千万左右的地富反坏右，前几天就有人从温州跑到恩施，在那捣乱。这就是敌情，你们人大我看有相当数量的特务，否则为什么苏修的报纸、日本的报纸，对你们的动态，对你们组织的人名那么快就登上了，两派都有，今天只说这派了，那派保的是肖前。另外有奴隶思想，非常喜欢外国人到你们那参加你们的会，我们自己的事，我们革自己的命，请他干什么？当然了，外国人不一定是坏人，有许多人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其中混着不少坏人，国民党留下一批人，相当大一批人，难道他们不破坏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北京

这两大派，我感觉就是有这些美蒋、苏修、日本这些特务在后面作怪，你们有的是不知道，利用你们这种个人膨胀，爱好人家吹捧，听不得批评，我们批评你们，你们就跟我们疏远，敌人就拉你们。我今天批评你们，就是这个意思。

另外我讲一个立新功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军队讲了，今天给你们讲，你们有人觉得了不得了。功勋大，是立了些功，要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的好学生，就要每天想到自己为人民立了新功没有。犯了错误那就应该自我批评，立了功，那是本分，这一点我说过好几次了，你们听不进去了，你们已经是老大了，老大到连中央毛主席的话都不听了。多数是听的，我要说的是少数，少数回去想通了也还是会听的。这个立新功主要要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并且进入本单位斗批改。你们不去搞斗批改谁去搞呢？我说过这是最光荣的任务，这样伟大的历史任务，把资产阶级旧教育制度全部推翻哪！你们想过没有？你们的灿烂青春哪！你们没想哪？我们有个设想，还没有正式决定，决定了要制定一个通令，限期一个月都回来，这样毕业生就可以回来了，逍遥的也可以回来了，抓军内一小撮的也回来了，你们忙的也可以分一点工作给他们了。（有人反映毕业生拿工资不干事净睡觉），那就不给工资（康生：我的看法是要分析，分析不同情况去工作。其中有一个原因，学校里面斗批改没有抓住）。（同学继续反映情况）不搞斗批改就不毕业，教师也是这样，据我知道，教师是操纵你们的。今天晚上的会议如果你们脑子里还有那么一点缝的话，还听我们的话，斗批改就摆在你们面前了，当然大联合三结合没有搞好的就不行。没有领导嘛，各校可以自己考虑。总之今年一定要进入斗批改，不然到哪一年去呀？！我倒是愿意还去搞斗批改，现在是帮助中央搞点工作，我现在只搞了八个单位也还是挺辛苦的，恐怕学校的斗批改比较容易些，艺术更难一些。学校里那么多人么！你们不管怎样总是读了一点毛主席的书。你们都是大学生，你们不能单背毛主席语录，不能教条式地背，要认真理解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你们都有毛主席著作吧？（有！）话说多了没人听，今天我就说一点，请康老讲。

康生：同志们，我的发言不多，因为北京的学校，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接触过北大

的，北师大，间接接触到地院的，清华的。北大问题也好，师大也好，工人运动也好，我接触的很少。工作的分工么！由于分工，对北大的问题接触就少了，但却得到了一个“地派后台”的称号，不胜光荣的称号，不胜光荣之职了，我还没介入呢，总之觉得受之有愧。如果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还是支持聂元梓的，同时我也是支持谭厚兰的（江青对康老：聂元梓还是支持谭厚兰的），因为她当时反对薄一波，反对陶鲁茄的，反对孙有余，这是对的么。有一个问题我今天要对蒯大富同志讲一下，听说我的材料蒯大富掌握了（江青：还有体院的）。是从党校的干部子弟处弄来的，那些人许多是黑帮子女，有张际春的女儿，苏振华的儿子，孙志光的儿子，刘仁特务集团××的儿子，有那么一批人。我那时就说你们和党校联系要注意批判刘邓、林枫这一小撮人。要抓住这个大方向，如果同党校联系，要同红旗队联系，不要同红战团联系，红战团就是这一些人么！我一个很好的心，你们都以为我是怎么样的，蒯大富以为我害怕了，怕你们把我揭露了，怕你们把我打倒了。有的问题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和蒯大富讲过，清华的问题刘少奇认为我是清华的后台，当时十一中全会时专门找了我斗了三小时，我说清华的问题我不清楚。把陈伯达同志找来吧，结果伯达同志和我两个人对付他。我没和蒯大富讲过，当时刘少奇专门单独找到我，单独在人民大会堂，在江苏厅啊！我说我不清楚。他听了一下子跳过来说：“你不清楚我清楚！”他说：“我是保护蒯大富的。”我说你把他关起来是保护他吗？你把他团籍开除是保护他吗？这些我因个人的关系我不愿意讲，以后对清华的工作我没有多管。我想今天讲话首长讲这么一个共同的意见喽。上次江青同志的讲话也好，这次也好，我们谈话的目的就是爱护的观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观点。毛主席不是讲过吗？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语录第27章专门讲批评和自我批评，我希望同志们认真读一读。然后正确了解首长的几次讲话，这不只是我们讲的，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江青同志讲了，毛主席说现在是青年学生轮到犯错误的时候了。这是个问题，我希望同志们正确地理解这一问题，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以身作则，拿我们过去犯的错误来教育

提高你们。第二个问题，我常常想到，毛主席讲，一个工厂里两派斗争，一派说是革命的，说另一派是保守的，甚至武斗。毛主席讲这两派之间到底有没有阶级基础，到底有没有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矛盾。毛主席说我看不到。当然个别的地富反坏特除外。两派大部分是阶级弟兄吗！外地比北京厉害啦，甚至开枪、放六〇炮，甚至放高射炮的都有，从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可以想我们的学校个别的坏分子是有啦。比如我同聂元梓讲过，过去反聂元梓的里面有个女的叫杨勋，他的弟弟叫杨炳章是坏分子，恐怕是特务。但是每个学校里学生这个一派，那个一派，而且斗争的非常厉害。地质同北大，北大同师大，同志们想一想，到底有没有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地方？（江青：缺乏自我批评）为什么这一派要吃掉另一派？天派要吃掉地派，地派要吃掉天派？地派要从地下钻出来，否则就要被埋葬了，天派也要落下来，否则就要跌死。有的人言行不一致，会上说的是一回事，回去做的是另一回事，正如江青同志讲的言而无信，具体说来就是两面派的做法。为什么我们革命小将会有这样一种做法？错了就改么！错了不要紧，可是你们却恐怕我们知道你们错了，要光明磊落（江青：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的记者已经急得哭了。这是一个什么行为？阻止中央了解你们的情况）。这是两面派的做法，是资产阶级政客的一种手法，这是为什么呢？这些群众组织开始了一些特务手法，天派也好，地派也好，都有。不是说你们全部活动都是这样，而是说有些做法是特务手法。从什么地方学来的？从什么地方沾染的？那么一种思想方法，一篇文章只研究那一句那一个字，不是研究整个文章的思想，为什么在我们革命小将身上有这么个思潮？这里边就是有一小撮走资派的幕后操纵，要警惕，要提高到阶级斗争观点来看。第二，正如总理讲的有美国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有黑手，当然他们往往是打着红旗的，有时是通过间接的方法，不一定直接出面了。戚本禹同志讲的孙泱就是通过别人（总理：农大东方红昨天跟我说秦化龙表面上说的话很“左”，比王震同志还“左”了，所以许多人认识不清，这就是受蒙蔽么！有坏人煽动，我们应该引起警觉，农大东方红是地派的了，对这一点应该表示欢迎的）。我的话讲多了，我对其余的了解的也不多，还有一点就是要有敌情观点。外事口有外国人，有美国人，有特务，你们将来

就会知道的（江青：我建议你们到地质，9月12日中央气象局红旗兵团抓黑手战斗队贴了一张大字报值得参考，他是研究问题的，值得参考。大字报的标题是：谁是最大的黑手，三十个为什么？）。同志们，你们的敌情观念太缺乏了。警惕性很麻痹。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就是社会思潮，这种社会思潮就是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就是江青同志讲的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也有的是从极“左”的方面（江青：右和极“左”是通着的），是的。

今天我看到一张小报，清华井冈山今天出的，大概有篇社论性的。我认为是很错误的。我倒不是熟悉你们清华的材料，但是九月七日苏联的修正主义者勃列日涅夫到匈牙利做了个报告，一个很长很恶毒的报告，最恶毒的报告。他讲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我们准备回击了。同志们有的就看见了在北京的小报上有人说的相反，说苏修批评我们是极“左”的。我说哪有这么个小报，他说是清华的，这个小报文章的名字叫评什么极“左”思潮，文中最后说这种极“左”思潮是根本没有的（江青：我插一句，你们用小报，我们就用大报搞你们，你们如果再犯错误，我们就一个一个通报你们）。如果按你们的说法，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都没有了，连“左”派幼稚病都没有了。这不但是江青同志讲的，而是毛主席讲的，列宁讲的。当然“左”和右的性质是一样的，但“左”和右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这样单纯从题目看就是违法毛泽东思想的，违反马列主义的，这个文章是社论喽，不是文章，头一句话就错了。头一句话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几个现代修正主义的小丑在那里发出批判极‘左’思潮的叫嚣……发出嗡嗡叫的抽泣。”同志们，你们看过参考消息吗？勃列日涅夫在那里骂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你们却说他们是批评我们是极“左”思潮。你们怎么看待修正主义对我们的攻击呢？他说我们是反革命，你们的报纸说它批评我们是极“左”啦。后来这个文章我就不明白了，也许是对着四·一四的，我就不清楚了，还有什么畅游颐和园，还有什么除三害，除掉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但是问题在哪儿？问题是反对“揪军内一小撮是自焚长城”。这个东西是江青同志讲的。为什么你们的报纸今天恰恰又出了这么一个文章？你们说揪军内一小撮是林杰还有什

么人搞的，总理讲了么，江青同志讲了么，你们清华五千多人走了么，到河南去反对新成立的卫戍司令部，反对刘建勋，在上海反对张春桥，在武汉反对刘丰、曾思玉。我当然不止说清华了，还有北京的学校，有师大的，还有……你们不同意这个观点，你们报纸中有么（江青：这个文章是谁写的？蒯：今天上午我看了以后，马上回去打电话说文章有错误，说不符合中央首长讲话精神，不符合……江青：你简直是开中药铺）。听说卖小报的地方热闹得很，外国人买，你们很高兴。应该发一个通知，不卖给外国人。你们出这样的小报，红旗、人民日报要批评、通报。我赞成点名批评清华井冈山报（江青：还有的小报完全是国民党那一套形式。戚本禹：还有的登了些绝密的东西。江青：一定要肃清流毒，全国发行么！还卖给外国人，做外国人的义务情报员，做国民党的义务情报员）。（一个语言学校的同学讲：我们两派都有外国人，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你们去斗一斗蒋南翔吧，蒋南翔搞的这种特务学校么！我们讲不要动摇解放军，反而说我们是对准革命小将了（江青：对了，我记起了一个事情，蒯大富说“十条总是靠近些”我说八条还是有效的。蒯大富就是有一贯的思想。八条也好，十条也好，都是我们小组和总理讨论的。总理：你好好把江青同志那天的讲话读一读，不要用十条反对八条，这样肯定犯错误）。报纸中间还有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就是他们一小撮人想动摇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干扰毛主席领导的中央。报上怎么讲的？提到“打破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问题。意思是反对极“左”思潮是不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解释说，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明明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是极“左”，现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但是在一小撮走资派盘踞过的单位必须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比如对彭真的北京市委不正是这样做的嘛！这是非常错误的，国家机器最重要的是什么？在北京市就是这个傅崇碧。我们把军队都打破了吗？没有么。你们的报纸上这样写，就是有问题。而且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革命组织说了错话，这是不能保证的，即使有人说了错话，怎么能同美蒋特务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相提并论？所以这一点就是有走资派操纵，也有敌人、特务的黑手，也有社会思潮的影响。你们应该认真检查，还有一点，我也看出来，你们有的同志言行不一致（江青：我还称

他们为同志，我们还信任你们，你们就称我们“先生”了)。当然你们的“先生”不一定是我们了，但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嘛！（蒯大富：“揪军内一小撮”是敌人提出来的，我们上当了。江青：我们还是保你。有人说总理是最大的保皇派，我是小保皇派，我都保，生怕你们犯错误，可是你们犯错误也不自我批评，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江青：今天的会很长了，结束了。我们想宣布，你们不要上街去贴这个会的大字报，你们贴吗？（不贴！）我们今天晚上是推心置腹，找出犯错误的人挽救他，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你们自己想一想。

康生：对了，电影学院的同学问我一个情况，我只知道这个人（电影学院问的一个人）是老红军，和外国人有关系，和外国人有勾搭的人你们就要注意。

谢富治：最近总归是按江青同志提出的光荣的战斗号召。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配合全国的大批判，这就是光荣的战斗任务，是不是紧跟毛主席，是不是背后有坏人就可以看出来。遵照毛主席提出来的伟大战斗任务，你们听不听啊？（听！）

康生：还补充一点，这点以后再讲了，你们不仅对形势估计得不对头，而且对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估计得不正确。你们许多问题看法不对，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方法。因为从你们的小报上可以看出来，地院朱成昭那一套就是从香港学来的，同香港的看法一样。揪出一小撮走资派，丝毫不能损害我们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江青：体育学院也应该点名了。在这个范围内你们整理康老和伯达的黑材料，实质上是包庇贺龙。

康老：整理材料我也不怕，你们如果要材料我倒可以提供给你们。你们说我有两大罪状，一条是对准解放军，第二条是实行白色恐怖。这是一条大罪状，你们整理材料可以整上，你们整谁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这四十年中犯过不少错误么！也不止是你们了，还有许多学校喽。蒯大富同志我跟你说一下，党校有个红战团是黑帮控制的，现在又开始活动，现在又向你们28团活动。

江青：你们还能保证你们没有后台吗？（韩爱晶：我们查一查）哎，这就对了。

（体院一代表：我们整了康生同志的材料，我们犯了错误。我们检查。我们没整伯达同志的材料）

戚本禹：反正是你们体院系统。

谢富治：革命的大联合是最关键的问题，不要搞什么两大派，要互相吸取优点，不要互相拆台，要自我批评。

伯达：要学习毛著，要联系自己学习刚才首长的讲话。

康生：我还讲了，除了毛主席著作之外，还要学习这本书，就是“左派幼稚病”里面的第四章，小资产阶级革命性。

伯达：搞大联合，搞一个单位一个组织，不要搞两大派。

江青：多做自我批评，韩爱晶、蒯大富向谭厚兰做自我批评，谭厚兰向你们做自我批评。这一次主要是你们不对，性质是严重的，你们不想想，想打倒师大，别人不会打倒你们吗？

戚本禹：想打倒一切的人，最终要被打倒。

康生：聂元梓同志啊！以前北大有打倒谢富治的话，你们要好好考虑了。

戚本禹：这不是偶然的。

江青：说穿了，打倒谢富治，聂元梓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总理：这么搞，想搞垮革委会，这样暴露了你们自己。

康生：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是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机构，怎么能打倒呢？要从保卫红色政权的角度的角度，积极斗争的角度研究问题。

江青：都是头头们搞的，群众不会搞。群众是不愿意搞的，你们头头要不搞，群众是不会搞的。散会。（热烈鼓掌）■

（1967年9月17日凌晨零点45分会议结束）

【编读往来】

1. 印红标谈古樟和辛伯仁之文

《记忆》147期刊登的古樟的文章，质疑北大文革初期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的回忆，对若干重要事实点进行了考订。文章引述资料可信，分析和立论扎实，具有说服力。作者文风平实诚恳，既指出张承先回忆中的差错，追寻真相，又对差错的产生抱着理解，令人感到犹如吹进一阵清风。文革研讨需要摆脱官式的思维框框，需要考辩、批评与拷问，同时也需要对历史当事人的理解和宽容。如此才有望学术的深入。■

《记忆》147期刊登的辛伯仁的文章，对目前争论较多的北大文革中几则历史事实和评价提出看法。尽管其中一些史实和论点尚需继续研讨，但对孙蓬一错误和个性、邓朴方致伤原因、北大武斗发展过程等问题，注重资料依据，有说服力。作者有意识地摆脱官式思维的框框，努力避免派别情感的局限，观点鲜明又对特殊历史条件下当事人的过错抱着理解，着重事实考察，有利学术研究的深入，给人印象深刻。■

期待《记忆》推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2. 常风答叶宁与顾勉之

《记忆》147期中读者来信中，有叶宁和顾勉之本人发表在《记忆》143期中的拙文进行指责。本人答复如下：

叶宁认为不能对聂元梓、孙蓬一在文革初期反对邓小平的行为进行批评，因为当时全国都在批判刘邓，在这个问题上拙文作者和孙蓬一是“平起平坐”的。本人不能赞同这种说法。聂元梓和孙蓬一作为北大校文革的主要负责人，经常接受中央“首长”的接见，他们掌握的信息比普通百姓多的多，他们的作用也比普通百姓大得多，他们可以下令北大上万师生进行上街游行等行动，他们写的关于邓小平的大字报也是全国第一张公开对邓点名

的大字报，影响很大。其后《新北大》校刊又连篇累牍地发表了许多攻击反对邓小平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聂孙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我们普通百姓有这个能力吗？能够和他们平起平坐吗？再如在文革中我们都反对和批判过陆平校长，这是我们应该检讨和反思的，但是普通学生和聂元梓通过反对陆平进而反对北京市委和部分中央领导人的意图和行为能够等量齐观吗？

顾勉之说拙文提到的1966年10月6日北大历史系教授沈迺璋教授自杀时北大“并不由聂孙主事”，是顾先生自己记忆错误。1966年7月28日，北大校文革筹备委员会成立，聂元梓任主任。1966年9月9日，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还是聂元梓任主任。这时工作组早已撤离北大，校文革是最高权力机构，在校文革统治北大时期成立了“劳改队”，对许多革命干部和教师进行批斗，导致多名干部教师非正常死亡，当然应由他们承担责任。北大文革可分为三个阶段：工作组阶段、校文革阶段和工人解放军宣传队阶段，每个阶段发生的事应该由各阶段的领导者负责。本人文章并没有把“凡发生在北大的事都应该由聂孙负责”的意思。

对回忆反思文革的文章有不同意见可以探讨，对文章中的错误可以指出，但不应用挖苦、讽刺的语言来说话，因为作者和读者都是平等的。■

3. 张从纠错

1. 王复兴文章中提到的北大校医院自杀的郭淑贤，应为郭湘贤。
2. 希望贵刊作者与编者谨慎，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多加考证，不可再犯类似错误。■

4. 甘仲义谈辛伯仁文章中的问题

1) (13页)“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从3月至6月，多次向中央文革、国务院办公厅递交了反映吴传启、林杰、王、关、戚等人问题的材料。——此处不确切。除隐患只是整吴传启及以下人的材料。当时公社总部有指示，林杰的材料都不让整，

何况王力等。

2) (13、14页)6月5日陈伯达发表了两次讲话(一次是6月5日清晨在北大大饭厅……)。——事实是:陈伯达的讲话只有一次,就是6月5日晚至6月6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他和谢富治一起接见红代会核心组时的讲话。陈伯达的这个讲话,使北大大乱。7月初,在反对派多次冲会场的情况下,聂元梓和驻校解放军去找陈伯达,反映情况(那些天,北大不止一次去找过陈伯达)。在这种形势下,陈伯达用电话告诉聂元梓,说他直接到北大来,并于7月10日凌晨(2:30~4:00)来到北大(1967年11月新北大公社火车头编辑部出版的油印材料有详细记载)。《北京大学记事》和聂元梓的记忆都有误。作者引《聂元梓口述自传》的相关内容,就是7月10日前后陈伯达讲话的内容。

3) (14页)5月22日成立的“北京大学红卫兵红旗飘战斗队”。——北京大学红卫兵红旗飘战斗队是1966年的名称,领导人是牛辉林,那时是拥护聂元梓的。1967年5月22日成立的“红旗飘”不可能再加北京大学红卫兵几个字。

4) (15页)其目的是扑灭新北大点燃的方兴未艾的全市反吴传启、反林杰、反王、关、戚、反谢富治,反极左思潮的熊熊烈火。——只能说到吴传启。

5) (16页)“奉周总理指示到高教部夺权”——总理在1月18日说:“北大、清华、师大等综合大学,在国家机关夺权中多做些贡献。”没有具体指示到高教部夺权。

6) (17页)“煽动地派学生反新北大”——那时地派的名称还没有出现。

7) (20页)新北大首次炮打谢富治发生在4月13日、14日两天。——只是13日晚上。

8) (23页)9月1日,周恩来、江青、中央文革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公布了王力、关锋的罪行及其倒台。随后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10万人群众大会,公布了王力、关锋的罪行。陈伯达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小爬虫王力、关锋!”——1967年9月1日召开的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中央以王力、关锋不出席会议的方式宣布他

们的倒台。此次会议没有提及王力、关锋，更没有公布他们的罪行。10万人大会是1968年3月27日，关于杨、余、傅问题。■

5. 张从对本刊的批评与建议

贵刊147期的导读说：“辛伯仁之文，垂范当下”，很不妥当。“垂范”一般是指领导人起的带头作用，这篇文章怎能够其到这个作用呢？何况北大文革问题复杂，很多问题都有争论，他这篇只是一家之言，内容也有很多错误之处。所以希望纠正这个说法。

另外那两个读者来信就更加荒唐，态度也很不好。如果对拙作的内容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用几句话来挖苦，太不严肃，何况他们说法也是毫无道理的。

希望贵刊最好像《炎黄春秋》一样，每篇注明责编姓名，以示责任。另外不必再写导读，读者自己会读的，不需要导读。

北大很多校友对贵刊很有意见，今后我是否还和贵刊联系和供稿，值得考虑。■

6. 《记忆》编辑部答张从先生

张从先生对本刊提出的批评，本刊试答如下——

1) 张从先生建议，本刊“最好像《炎黄春秋》一样，每篇注明责编姓名，以示责任。”这个建议很好，本刊已试行（见149期的“读者来信”之后）。并将从本期开始将责编姓名公示于全刊正文之末，本刊声明之前。

2) 张从先生认为，本刊“不必再写导读，读者自己会读的，不需要导读。”本刊的导读有两个功能，其一是提请读者关注某些文章；其二是表明本刊的态度。因此，不写导读之请，本刊恕难从命。

3) 张从先生认为，147期的导读在谈到辛伯仁的文章里，使用了“垂范”一词，而这个词的使用，“很不妥当”。理由是“垂范”一般是指领导人起的带头作用，辛伯仁之文不能起这个作用。关于“垂范”一词的使用，我们要解释一下。垂范可以用在

领导人身上，也可以用在平民百姓身上。唐代的韩愈在寄卢仝一诗中，就有“立言垂范亦足恃”的句子。韩愈所说的垂范者，不是领导，也不是长辈，而是一位住在破屋子里，没有隔夜粮的平民知识分子卢仝。现代汉语中，“垂范”一词更为广泛地用在高于众的普遍人身上。辛文虽是一家之言，且所涉历史有不确不实之处；但是他不偏不袒，理性冷静地分析了常风和章铎的分歧。态度中正，语气和缓。对于至今还抱着派性的人来说，辛文有榜样的意义。因此，本刊称其“垂范”似并无不妥。

4) 张从先生认为，辛伯仁的文章“也有很多错误”。错在哪里，请张从先生像甘仲义先生一样，撰文一一指出，本刊愿意全文发表，俾便正误纠错。

5) 张从先生认为，顾勉之和叶宁的态度很不好，“挖苦”，“太不严肃”。在接张先生来信前，我们即已向顾、叶提出这个问题，希望他们修改。但是，他们坚持原文发表。对于读者来信，本刊的作法是，先征求写信者的意见，如其俯允发表。我们再询问来信者是否需要修改文字。如来信者同意发表而不愿修改，本刊就只能遵循来信者的意愿，照原样发表。此点请张先生谅解。

6) 张从先生表示，“北大很多校友对贵刊很有意见，今后我是否还和贵刊联系和供稿，值得考虑。”首先，我们感谢张先生告诉我们这个信息，同时，我们也诚恳地希望对本刊很有意见的“北大很多校友”，将他们的意见像您一样赐示本刊，以便改进。

最后，我们要向张先生的直率赐教表示诚挚的谢意，在这种善意的监督之下，本刊将高悬鞭策以自警，为促进文革研究，戮力前行。■

《记忆》主编：启之（吴迪）

2016-1-25

本期责编：黄德冰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